

口述歷史的理論與實務

侯坤宏 前國史館修纂處處長

【摘要】口述歷史，是一種經驗分享，也是一種學習；它是一門理論與實務兼具的學科。口述歷史是以記載人物事蹟為主，依據個人經驗，經由口講述出，採訪者以錄音、錄影、文字筆錄方式，蒐集口傳記憶及具有歷史意義的個人觀點，整理編纂而成。重要的是，要能把握口述歷史的精髓，能夠親自參與，蒐集、記錄所需的資料。

本文介紹口述歷史與新聞採訪、田野調查的關係，由口述歷史在臺灣的發展談到國史館出版的佛教人物訪談錄叢書，以及說明口述歷史訪談的程序與要領，並將「三法印」的原則運用在口述歷史的訪談上；最後略述口述歷史的工作倫理、可能的陷阱，以及對佛教史研究的貢獻。藉由設定明確的目標與規劃，透過正確有效的執行方法，達到口述歷史美好的成果。

關鍵詞：口述訪問；口傳記憶；口講；佛教人物訪談錄；國史館

一、前言

非常感謝主辦單位自衍法師的邀請，我和他交往幾次，覺得他在圖書館方面、在整個文化或在整個課程安排設計上，擁有獨到的專長。在我過去研究臺灣佛教史的過程中，會特別注意臺灣佛教團體重視哪一方面。結果發現，香光尼僧團確實在整個戰後臺灣佛教的發展，有其特殊之處——非常重視文化的傳承與教育，而這些也表現在它所推廣的一些活動上。

2013 年曾應香光尼眾佛學院的邀請，為該院師生進行為期兩天的口述歷史課程，據說效果還不錯，故希望可以針對居士們推動口述歷史的工

作，讓它能夠在地生根，對當地的文化，不只是佛教，也能做一些貢獻。我覺得這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我很樂意與大家分享。

今天的課程主要是以實際為主，理論為輔。就口述歷史來講，是一門理論與實務兼具的學科，就像修學佛法，懂得一些佛教的理論，也要做一些實修的功夫一樣。你可以把口述歷史當作是一個很新的東西：所謂「新」，就是發展還不到一百年；但它也可以是一個已經有兩千多年的東西。例如中國司馬遷所寫的《史記》，內容有些是作者直接到當時發生歷史的場景去訪問、記錄下來的。所以，有人說，在中國或西洋整個歷



史的潮流裡，史學的著作過程，在很早以前，歷史學家就已經利用口述歷史這個學門了。

在口述歷史的過程中，實際去做是很重要的。對於想踏入這個領域的人，對理論最好也要有基本的了解。過去兩、三年來，我曾經寫過幾篇有關檢討臺灣近年來口述歷史研究成果的文章，發現其中有些書被列為口述歷史，但以口述歷史的標準來看，卻又不是口述歷史，因為它只有其中的一部分是用口述訪問整理出來的資料。會出現這樣的問題，是因為參與這個工作的人對口述歷史本身沒有基本的了解。因此，我認為對口述歷史的理論有一些了解，是很重要的。對口述訪問、口述歷史而言，經驗分享也是一種學習，而我今天有機會來和大家分享這樣的經驗，感到非常榮幸，也非常高興。

二、口述歷史的定義

口述歷史是歷史學的分支，透過口述訪問可以蒐集到文字以外的史料。歷史學本身包羅萬象，古今中外都可以包括在裡面，甚至剛剛發生過的幾秒鐘、幾分鐘，它就是歷史。一般來講，我們不會把這麼近的東西當作是歷史。

口述歷史的特色，或者它對歷史到底有什麼樣的作用？「口述歷史是以記載人物事蹟為主，依據個人經驗，經由口講述出，採訪者以錄音、錄影、文字筆錄方式，蒐集口傳記憶及具有歷史意義的個人觀點，整理編纂而成。」這個定義是我去年在嘉義香光尼眾佛學院上課的內容，後來刊載在《青松萌芽》第 19 期（註 1）。其中，提到個人經驗，這是很重要的。口述歷史不是個人從書本裡面或從其他人那裡聽來的東西再轉述，

因為這不包括個人經驗。是經由口講的方式，由去訪問的人用錄音、錄影的方式，之後再以文字呈現出來。

口述歷史是一種蒐集資料的方法，強調具有個人觀點、有其主觀性，所以內容可能會比較精彩，具有可看性，但問題也可能出在這裡。也就是當口述歷史的記錄完全忠實的呈現時，對受訪人或主訪人可能都不會覺得有問題，但對被講到的第三者——當事人而言，有時候即使是很微小的事情，也會出現極大的反彈，因為與他最相關。所以，當我們在做口述歷史的工作時，要公開現場的錄音或錄影資料之前，要相當小心，嚴重時，可能會觸犯法令。

不同的人對口述歷史有不同的定義：

貝絲·羅伯森（Beth M. Robertson）在《如何做好口述歷史》（*Oral History Handbook*）一書中的定義：（註 2）

口述歷史是過去的圖像，而這種圖像原本並不是以文字而是以口語來表現。……對於口述歷史的實用定義如下：

- ◎以問答方式進行訪談，並予以記錄，
- ◎由對於討論的主題有所認識的訪談者來進行，
- ◎受訪者對於討論主題亦應有所認識，並從個人

曾參與的部分來進行說明，主題亦應具有歷史意義，並應讓其他研究者也能應用此成果。

過去的圖像是什麼？什麼叫做歷史？簡單來講，所謂歷史，就是過去發生的影像，但一般所理解的歷史可能是被記錄下來的東西。原始的圖像與記錄下來的歷史，是很不一樣的。記錄下來的資料，是經過記錄者的消化或者有主觀的意見在裡面了。例如過去我曾經研究二二八事件，這是戰後臺灣歷史一個很重要的事件。二二八在解



嚴前後是一個很重大的歷史事件，不同黨派的支持者有不同的解釋方式，所呈現的記錄也都是根據不同的意識形態做整理的。什麼是二二八的原型？大家一直都不清楚，就好像飛機失事以後，沒有找到黑盒子，就永遠無法知道事情的真相。歷史有時候也是這樣，尤其在比較具有爭議性的事件時，其爭執更大。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觀點，口述歷史用過去的圖像，原本不是以文字而是以口語來表現。根據作者證明，所謂過去的圖像，其實是經過當事人的口述，與我剛剛所談到的原始圖像，可能有距離。到底真實的歷史是什麼？最本源的歷史又是什麼？大概是很少人可以掌握的。例如有時候我們要談一個時尚的東西，必須透過一些文字來說明，但最原來的那個東西卻只能透過二手的東西去推測、累積。就口述歷史來講，我們能做的也是這一部分，儘量讓它比較符合歷史的原貌，這是理想的目標。雖然永遠沒有辦法做到百分之百，但我們只能朝著縮短時間差距的方向、目標去努力。

再談到具體的口述歷史定義，是和運作有關聯。首先，是以問答方式來進行，並給予記錄。錄音、影像當然也是記錄。透過錄音再將它整理成文字，也是一種記錄。口述歷史不一定要三者具備，有時候最需要的可能是文字的部分，但有影像可以留下當時的一些真實背景。其次，是由對討論主題有所認識的訪談者來進行。這牽涉到受訪人與主訪人兩者之間對於所要進行的主題都要有相當的了解。在這個過程裡，以受訪人為主，所談的是他個人最具有歷史意義的部分。以佛教人物的訪談為例，當我們決定訪問這位居士或法師的時候，要請他講的內容必須事先有一些規

範、設計。所以，口述歷史是當我們做了一個作品以後，也希望能夠讓更多人看到並分享成果。

唐諾·里齊 (Donald A. Ritchie) 在《大家來做口述歷史》(Doing Oral History) 一書中的定義：(註 3)

口述歷史是以錄音訪談 (interview) 的方式蒐集口傳記憶以及具有歷史意義的個人觀點。口述歷史訪談指的是一位準備完善的訪談者 (interviewer)，向受訪者 (interviewee) 提出問題，並且以錄音或錄影記錄下彼此的問與答。

唐諾·里齊 (Donald A. Ritchie) 與貝絲·羅伯森 (Beth M. Robertson) 的定義，大同小異，都是以訪談的方式進行。唐諾·里齊 (Donald A. Ritchie) 還談到在從事工作之前要有準備，才能達到比較好的效果。通常我們的作法是先清楚了解要訪談的對象，根據對方的特質做一些訪問大綱，再依大綱進行訪談。有關這方面的內容，後面會再詳細說明。所以，口述歷史是透過雙方對談的方式，將影像留下來做記錄。

楊祥銀著《口述史學》一書對口述歷史下的定義：「口述歷史就是指口頭的、有聲音的歷史，它是對人們的特殊回憶和生活經歷的一種記錄。」

(註 4) 我認為這樣的界定，也是相當簡明、清楚的。

目前全世界很多國家都在進行口述歷史的工作，大部分是由有歷史學研究背景的人來做，有不同的作法，也有不同的主題。剛剛特別翻閱課程的講義，發現附錄的部分列出很多口述歷史的書目，對於大家進一步了解口述歷史的理論，相當有幫助，大家可以找一些來看。這就好像我們在研究佛法或者修學佛法的過程，有時候藉由聽法師或居士講課、講經，吸收到一些東西；另一



種方式是自己讀、自己看，也是可以吸收一些東西。這兩種方式非常的不一樣，而且都很重要。如果要再進一步，可以根據自己特別的喜好興趣去了解更多，將你的經驗都記錄下來，和其他人分享，這是另外一種層次的問題。如果不是專業或是很有興趣的用學術角度來切入，第三種方式大概就不需要了，因為這是屬於比較少數人、學者型的方式。

所以，對口述歷史下怎麼樣的定義都無妨，重要的是要能把握口述歷史的精髓，能夠親自參與，蒐集（記錄）所需的資料。也就是讓大家了解，口述歷史是透過一問一答、主訪人的訪問記錄下來，再用文字、影音呈現，提供其他人研究，並留下記錄。

三、口述歷史與新聞採訪、田野調查

和口述歷史比較相關的是新聞採訪與田野調查。

（一）新聞採訪

我們看電視、報紙或網路新聞，這些資訊的來源都是透過新聞記者的採訪。新聞記者的採訪，是新聞記者用以蒐集新聞素材的必要手段，講求時效性、即時性。基本上，一個合格的記者一定要重視客觀性、準確性與公平性，才能如實的報導一則新聞。有些記者會有特定的色彩或政治傾向，或是對某個人特別的喜好，這些都會影響他的報導。

就新聞採訪與口述歷史二者的關係來看，記者的工作也是採訪，就這一點來講，和口述歷史很像，但口述歷史產生出來的東西不像新聞記者

那麼快。新聞可能當天或者幾個小時就馬上要見報；而口述歷史，根據我個人的經驗，有些是經過好幾年，甚至十幾年才定稿、出版。此外，口述歷史比較是站在一種求真的角度，或是為歷史負責的角度，來做這些東西。所以，在訪問整稿的過程中，認為有疑問的部分就會再找其他相關資料來核對，確認受訪人所講的內容是否正確；如果有錯誤，就要把它改正過來。

身為記者，必須努力提高自己採訪的技巧，必須訓練自己一面提問題時，就能一面消化對方談話的旨意，還要能同時把對方的談話正確筆記；有時還要誘導對方說話，有時要判斷對方的反應，還要儘可能把關鍵細節都問到，沒有事先準備是做不好這項工作的。所以，一位稱職的新聞記者在進行採訪時，應留意如下幾個方面：1. 怎樣做採訪前的準備工作？2. 怎樣提問題？3. 怎樣與採訪對象建立密切的關係？4. 怎樣保證報導的準確性？這些原則，同樣適用於口述歷史。

（二）田野調查

田野調查，簡稱「田調」，又稱田野工作（field work），是社會科學領域中很古老的蒐集資料方式。此研究法的主要意義是，研究人員在某一特定自然環境中進行研究，一般多用於人類學和社會學領域。不同研究領域在運用田野調查都有其專門的操作方式和不同的關注重點；如人類學領域偏重定點、長期的觀察以及地質材料的調查，而社會學領域比較重視量化資料，主要工作方式包括訪問、問卷、電話訪問、實地觀察等。

田野調查法較適合運用在無法量化的研究主題，如社會現象的觀察、了解自然情境中的人類態度與行為，或是理解互動中的人群情況與社會



過程的變化等。換言之，凡是涉及人類心理或情感深層改變等因素之調查，較適合使用田野調查法。

田野調查一般是被社會學家或者人類學家所採用，因為他們需要待在某個地方、某一座山裡的部落、某個村莊，或是某個社區，採用定點的方式，長時期觀察，透過不同的方式去理解所研究的這個社區、部落。有一位很有名的社會學家費孝通，1936 年他就在中國江蘇吳江縣震澤鎮的一個村莊（開弦弓村）進行長期調查，並出版了一本《江村經濟》；等到 1957 年，再回到那個地方去；在大陸改革開放以後的 1981 年，他又三度到那個村莊去。長期的關注同一個地方，長時段的對這個地方做追蹤研究，得出在這個村落近幾十年或近百年來發展的一個情況。這是人類學家採用田野調查的方式。

在田野調查的過程中，所投入的時間和精神，與口述歷史是不太一樣的。口述歷史有時是經過好幾年的時間才能完成，但通常是一個星期約定訪談一次，每次大概進行兩個小時。像我訪問過中華佛學研究所，現在應該是法鼓文理學院的惠敏法師，前後進行了大概有五、六年的時間。這個時間聽起來好像很長，但真正訪問的時間沒那麼長。剛剛我提到比較正常的訪問方式是每一星期訪談一次，每一次譬如約好在星期六上午 10 點到 12 點，如果進行了 26 次，大概半年就可以完成一個個案的訪問。但惠敏法師當時在北藝大擔任教授或學務長，還擔任代理校長，也在中華佛研所擔任教職上課，同時也是三峽西蓮淨苑的住持，身兼數職，又常常到國外開會，推動大藏經電子化（CBETA），本來是一個月訪問一次，每次訪問約定了，在時間到之前，他常因沒空，

又往後延，有時是每隔半年才訪問一次，有時是一年多才訪問一次，好不容易到 2013 年才整個告一段落，我們希望 2014 年 8 月能夠完成出版。所以，訪問有時候要看對象，會有不同的處理方式、不同的機緣。

人類學家為了進行研究，長久的停留在一個村落，為了要深入了解，所以無所不問，無所不談，常常是打破砂鍋問到底。就口述歷史而言，研究者想揭開歷史謎題，好不容易找到一位值得訪問的對象，但當事人可能因有種種顧慮而拒絕，吃這種「閉門羹」，對勤於口訪者也是常有的事。以國史館的經驗來講，也曾經吃過閉門羹，例如我們曾經要訪問星雲法師、證嚴法師、惟覺和尚，他們的反應就不太一樣。像星雲法師那邊就說，要先把訪問的題目寄（E-Mail）過去：mail 過去後，結果得到的回應是這些題目好像也不怎麼樣；幾年以後，佛光山又覺得國史館怎麼不訪問佛光山呢？這是因為國史館後來做了很多口述歷史，有做出成績的時候，就會有很多人要接受國史館的訪問了。但是後來我都不敢接了，因為單位裡的長官說：「佛教做太多了，不能再做了。」

我們也曾經要訪問華梵大學創辦人曉雲法師，他的祕書也要我們將訪問的題目送過去，回來以後也沒有下文，但後來他們有安排我們訪問華梵基金會的董事、居士、法師等等，就是曉雲法師旁邊的人。雖然沒有訪問到曉雲法師本人，但也對華梵大學做了幾個個案的訪問，後來有一些有出版。又如惟覺和尚，我們覺得談到臺灣佛教，就是所謂四大教團，而他的行事作風好像和其他人比較不一樣，覺得這個可以留下來。老和尚本來同意了，我們就上山住了兩個晚上，並安



排我們參觀，但那時候老和尚摔倒、不方便；回來後感覺老和尚他們可能是認定，既然是以國史館的名義來訪問，也不好直接拒絕，就讓你們來參觀。其實我們去之前就知道他摔倒，但我們也不清楚他身體的情況是不是真的不好。這件事讓我覺得他們沒有意願，對於保存這方面沒有那麼急迫性，也覺得沒有必要，所以就沒做成。因為如果老和尚願意，我們把他整個訪問留下來，對中台山、對臺灣佛教，都是一個不錯的資料。另外，證嚴法師的情況也差不多，而且他們本身有慈濟的文化系統，也很留意這一塊，證嚴法師也有很多的傳記，所以不做也沒關係。

近代的民族學調查報告有一趨勢，即增加對個人生命史的記錄。口述歷史也可以記錄每個人的個人生命史。如果長輩做完了，也可以考慮其他人，像社會上各階層都有很多默默無聞的人，卻有很多感動人的故事，都是可以去發掘的。

四、口述歷史在臺灣的發展與現況

我們可以將口述歷史溯源到一、二千年。所謂中西古代的史學家在撰寫歷史的過程中，所應用的實地參訪口述訪問。但口述歷史或歷史學成為一種專門行業，時間並不長。所謂專門的行業，就是有些人可以依賴他的專長來生活。口述歷史這一行業的產生，是因為社會分工到某一程度的專精的關係，有些人就以教歷史、研究歷史為生。像我是以研究歷史、編寫歷史來生活的人，就是屬於這一行業的。

口述歷史這個學門，雖然講起來很遙遠，但近代記憶下的口述歷史，是從歐美開始，不到一百年，受到這股風潮的影響，臺灣才慢慢的形成。

一開始主要是與政治界或軍事界相關的主題，後來主題和範圍漸漸擴大，甚至與當代很近的事件都直接做了，如高速鐵路建設的人物、臺獨相關人物、美麗島事件等。這些事件在過去是不納入歷史研究的範圍，但最近有一種趨勢，就是發生在過去一、兩年的事件，就可以進行訪問，如三一八學運，在學運還沒有完全落幕之前，就有中央研究院幾個研究所一起合作，將現場的文宣或一些東西拍攝下來。

其實要有這樣的即時主動，才可能留下記錄；如果時間久了，很多的東西就流失掉了。做口述歷史也有這樣的用意在，就是現在不做，等這些人走了，就問不到了。因為口述歷史主要是透過當事人的口述而留下的記錄，其對象可以普及到普羅大眾，有合適的對象，就可以為他留下記錄。

談到臺灣的口述歷史，可以溯源自 1959 年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其後有國史館、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國防部史政編譯局（室）、臺灣省文獻委員會、臺北市文獻委員會、高雄市文獻委員會等史政單位，以及部分縣市文化中心（局）、私人單位等，紛紛投入。由 1959 年至今已超過半世紀，業已累積相當成果。以下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國史館、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國防部史政編譯局（室）四個單位為例，略述其口述歷史的成果。

（一）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自 1959 年就積極推動，1984 年成立「口述歷史組」，積極展開口訪工作；1985 年起，並針對企業界、科學界、醫學界、藝術界、婦女界、體育界人士及中研院院士進行訪問。為配合同仁研究專題及接受委託案，



展開相關人物專訪，對重要歷史事件參與者與見證人也進行訪問。前者如「唐榮鐵工廠專題研究」、「台南幫企業相關人物」、「走過兩個時代的職業婦女」、「海軍人物」、「菲律賓華僑華人」、「都市計畫前輩人物」、「日治時期在滿洲的臺灣人」、「九二一震災」、「郭廷以門生故舊」、「烽火歲月下的中國婦女」、「道德會相關人物」、「臺灣高速鐵路建設相關人物」；後者如「二二八事件」、「孫立人案」、「戒嚴時期政治案件」、「煙臺聯中澎湖冤獄案」、「泰源監獄案」、「美麗島事件」、「台獨相關人物」等。從 1982 年該所出版第一本口述歷史叢書《凌鴻勳先生訪問紀錄》後，迄 2012 年已出版口述歷史叢書 93 種 102 冊。這個數量相當多，且包括範圍很廣。

(二) 國史館

國史館截至 2012 年，已出版口述歷史叢書將近 80 種的口述歷史著作。其中包括政治（《梁肅戎先生訪談錄》）、財經（《謝森中先生訪談錄》）、《計政與國家發展：汪鋐先生訪談錄》、《縱橫臺灣石油工業半世紀：胡新南先生訪談錄》）、軍事（《汪敬煦先生訪談錄》、《賴名湯先生訪談錄》、《不再流浪的孤軍》、《孔令最先生訪談錄》）、文教（《澄懷觀道：陳奇祿先生訪談錄》、《鄭欽仁先生訪談錄》、《學海悠遊：劉枝萬先生訪談錄》）、婦女（《鄭玉麗女士訪談錄》）、醫學（《臺灣免疫學拓荒者：韓韶華先生訪談錄》）、藝術（《獅吼：《雄獅美術》發展史口述訪談》）、宗教（《臺灣佛教一甲子：吳老擇先生訪談錄》、《基督與召會：李常受先生行誼訪談錄》）等方面。

口述歷史不限於某些方面，也不限於這個人多偉大，如果有合適的個案，都可以做。每個人

都有他在這個家庭和社會上的一個定位，即使他是一個很平淡的人，也會有他可取的地方。國史館做口述歷史，要照顧到每一個宗教，照顧到全民，由全民學習的角度來看。其宗教部分的出版品，佛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主要是我和幾位同事負責的。除了佛教以外，還包括基督教，甚至還約請專門研究伊斯蘭教的張中復教授訪問一位信仰伊斯蘭教、與中東地方很有關係的外交官趙錫麟，在 2014 年出版了《天方學涯：趙錫麟先生訪談錄》一書。

國史館出版的佛教人物訪談錄叢書

我做佛教人物的訪談記錄，前後大概十幾年，如果全部出版，應該有二十幾本。目前（2014）正在進行準備要校對的有 2 本。其中一本是訪問林蓉芝居士，他是高雄中華佛寺協會的祕書長。這本訪談錄預定 7 月要出版，其重點是臺灣佛寺有很多違建、違法、納骨塔、產權登記不清或是整個寺廟繼承的問題等等。為了校對這本書，我上星期從頭到尾看了一遍，發現中華佛寺協會所做的事情，也是很有特色的。由於林祕書長對法令，尤其是有關佛教土地或財產登記的法令，相當熟悉。在臺灣佛教界有一個很特殊的問題，就是很多寺院的產權都不是很清楚，有的是寺廟財產登記或繼承有問題，有的是俗家的後代來爭產權的問題，因為寺方對於法令又不是那麼注意，這樣就可能影響寺院的運作，甚至引起一些訴訟。所以，佛寺協會就會幫助有些有產權糾紛的寺院解決問題，有些處理得不錯，有些還是沒有辦法完全解決。因此，透過這個訪談錄的出版，讓大家可以了解臺灣佛教有很正面的一面，也有很多問題存在需要面對考慮如何解決的一面。



國史館過去出版的佛教人物訪談錄有：

臺南妙心寺的傳道法師；恆清法師，他和悟因法師好像也很熟悉，曾經一起到印度開會；還有中壢圓光寺的如悟法師，圓光佛學院也是一個很特殊的地方，我訪問如悟法師的那一段期間，我坐的位置，他提說是以前阿扁來的時候曾經坐過的地方。還有因為少子化的關係，會發現臺灣有很多佛學院都是外國來的學生，這也是臺灣佛教界所要面對的問題之一。方甯書居士是法鼓山的信眾，他是東初老和尚的徒弟，與聖嚴法師之間的互動也是很有意思。東初老人將中華佛教文化館交給聖嚴法師，後來聖嚴法師透過這位居士，還有李志夫教授等人在背後運作，慢慢的成立了法鼓山。所以，透過一些訪問可以了解到很多人所不了解的背後運作的方式。像我所理解的法鼓山，如果沒有方甯書或李志夫，可能就不是現在這個樣子。另外，嘉義的宏印法師，他是中華民國佛教青年會的創辦人。成一法師，是大陸來臺灣的法師，在臺北濟南路和在美國都分別成立了華嚴蓮社，後來在臺灣又成立華嚴專宗學院。這個佛學院是專門弘揚華嚴宗的，也是很特殊。現在長老已經圓寂了，由賢度法師負責。賢度法師最近三年都在推華嚴學的研究，上星期才舉辦第三屆的研討會，很多都是大陸學者。臺灣華嚴宗的傳承，另外還有一位是海雲繼夢法師。

我想作為一個佛教徒或對佛教有興趣的人，對於當代臺灣佛教的一些情況，也要有一些基本的了解，如目前整體的臺灣佛教是怎麼樣、哪些道場有什麼特色、他們都在做些什麼工作、可能做的和我們有沒有一樣、我們的特色在哪裡等等。

另外還有五本：

第一本是臺北東和禪寺源靈法師，老和尚剛圓寂不久。他是日治時代一直到臺灣戰後的代表人物。訪談的過程滿有意思的，因為他小時候就出家，是屬於日本系統的和尚，有老婆，也抽煙、喝酒，這些在日治時代是被允許的。他主要是做經懺。透過這個訪問，我們可以了解臺灣佛教有關經懺佛寺的一些問題。東和禪寺是日治時代所建造的，中華民國政府來了以後，就在這個地方駐軍，很多人住在裡面；後來透過中華佛寺協會林蓉芝祕書長，費一番心力才將產權釐清。

第二本是吳老擇教授，他與菩妙老和尚都是孩童時就出家了。他對於南傳佛教、原始佛教初期和部派佛教，有相當深入的了解與研究。他曾到日本留學又還俗，後來老和尚邀請他回來主持翻譯《南傳大藏經》，這也是訪問他的主要理由，很值得記錄。最近法鼓山已經把《南傳大藏經》收錄到CBETA裡面，內容就更為豐富。前幾天，吳教授還到國史館來找我，我們談到一個問題，就是目前元亨寺還是以當年翻譯《南傳大藏經》最有特色，是屬於文化事業的一部分；等老和尚走了以後，後繼的人如果對這方面沒有意願，整個寺院就只能維持在一個過去的水平而已。所以，一個寺院要能夠擁有它的特色，還是離不開教育和文化的層面。吳教授曾經有一陣子帶領他的學生閱讀《大毗婆沙論》，這本論典很複雜，也極為繁瑣，好像天書一般，就好像西洋哲學的經院哲學、繁瑣哲學一樣，我看了十幾卷就沒時間再看了。還有他最近也出版一本關於研究媽祖信仰的書。做這個研究是有他的考量，因為媽祖信仰在民間相當普遍，而且學界有一種看法——媽祖是從禪宗的馬祖道一系統傳下來的。我們一



般看媽祖的雕像和觀音很像，同樣都是女神的信仰，像瑪莉亞也都是同類型的。這本訪談錄《臺灣佛教一甲子：吳老擇先生訪談錄》，也是國史館出版的第一本著作，因為銷路不錯，後來有再版。

第三本是圓香居士，他翻譯過很多的白話佛經。他翻譯佛經的經驗，是在翻譯每一部經典之前，一定會讀誦過一百遍，把經義讀熟、通暢了，再來翻譯。他很自信的說，這些東西可以留下來一百年。佛經翻譯在中國佛教史上有很長的歷史，是印度佛教傳到中國的一種理解方式；也就是說是一種翻譯、流通的歷史。當年是以當時的語言翻譯，我們現在讀起來好像是很古的文言文，不同時代、不同譯者所譯出的經典，有其不同的特色；而圓香居士是以當代人的語言重新翻譯過去的佛經，有其應機性，或許大家有機會可以找他所翻譯的佛經來驗證他的話是真還是假。

第四本和第五本是《臺灣佛教人物訪談錄》第一、二冊，是屬於合集，每冊收錄了 10 位左右的人物。會出版這兩冊，是因為訪問的這些法師、居士有時候一次就圓滿，文字稿可能只有一、二萬字或二、三萬字而已，無法單獨成書。所以，我們累積了 10 篇左右成一本書，現在還考慮要不要出版第三冊。在第一冊裡面，有訪問悟因法師，給我的印象很深刻。因為訪問時，正好是 SARS 流行的時候，本以為法師會說下次再來，結果還是讓我們進去訪問了，當時覺得這個法師很勇敢。第二冊訪問了妙雲蘭若的慧理法師、華雨精舍的明聖法師；臺中華雨精舍、嘉義妙雲蘭若、新竹福嚴精舍、臺北慧日講堂，這四個道場都是和印順法師的系統比較有關係的。

有些法師出版一本書，有些法師只能出合

集，原因是如果這個法師或居士的閱歷豐富，或是講課的法師，或是會編輯、書寫的，可能可以講很多的內容，很快就有一本書的分量；如果木訥寡言，訪問的內容不多，就沒有辦法單獨成書，大概要集合十個人才能出版一本。所以，會因為對象的個性不同、喜不喜歡講話、話多不多等，決定單獨成書或是出版合集。比較希望遇到的對象是，你問一個問題，他可以講兩個小時，可能給你稿子也很方便。像昭慧法師很會講話又有條理，問一個問題就可以講兩個小時，而且閱歷豐富，從事活動，雖然年紀比我還輕，訪問的內容就很多，可以出版上下兩冊。

像道海老和尚，也圓寂了。老和尚話不多，但為什麼可以出版一本書呢？臺灣佛教有幾個道場特別重視戒律這一方面，而道海和尚的南普陀寺就是屬於這一類型，因為有特色，所以我們才決定去訪問。其實也不一定訪問他一個人就好，也可考慮他曾經交往或者在旁邊的侍者、他的徒弟、佛學院的學生。如果要出版一本書，有什麼方式可以讓內容更豐富而完整？這是值得思考的一個問題。像我們會去訪問道海老和尚，是因為法藏法師的介紹，所以內容就有增加法藏法師帶領一些法師去訪問他的一些對話。如果大家去看這本書，就可以發現有些東西不是當初我們去訪問的。每一本書的呈現有它各自的因緣，這些資料背後是怎麼做出來的，這個只有參與的人最清楚了。

又如樂崇輝居士，他是北京同仁堂的後代，因為反共，輾轉逃到臺灣，退伍後創辦大乘精舍印經會，其後又創刊發行《慈雲》雜誌。《慈雲》雜誌已經出版三十幾年了，雖然小本，但每個月出版一本，我覺得以一個在家人，而且沒有設立



功德箱，長期投入這個工作，持續不斷到現在，是很不容易的。現在他年紀也八十幾歲了，算是退居的老居士，身體可能也不是太硬朗，目前已經把這個擔子交給吳彥隆居士負責了。大概是十幾天前他打電話給我，因為之前訪問時，他曾畫了當年北京同仁堂的地圖給我，他自己沒有留，希望我找出來再傳寄給他。透過對他的訪問，讓我們可以了解在臺灣的一些居士，是透過他自己 ways 在做一些文化的活動。在訪問錄裡面，我們當然也會談到他的家庭、與佛教的因緣，到臺灣來以後，在臺灣的發展，以及所遭遇的種種情況，還有他認識哪些人等等。在訪問佛教人物來講，大概都離不開這些主要的問題。

李志夫是中華佛學研究所所長，也是法鼓山成立的幕後重要人物之一，前面提到的方甯書也是。李教授是文化大學哲學系教授，主要是在學術研究方面，曾經到印度留學，也從事研究佛學。前後訪問了 26 次，每次 2 個小時，加起來大概四、五十萬字，是很有分量的一本書。有一件事是當時訪問時，聽了覺得很有趣的，就是在他年輕要去留學時，即使是自費，也要經過教育部考試。不過現在只要你有錢，有學校要收你，你就可以過去。當時他通過了要留學到印度的考試，教育部還有一個行前訓練，是將該年要去留學的人都找來上課。上課自我介紹時，李教授是第一個，當他說要到印度留學時，在場的每一個人都哄堂大笑。因為那時大家都是要去美國或歐洲，只有他要去印度。後來我再重新看文字稿的時候，也覺得很有意思，為什麼當時會哄堂大笑，這件事情也讓我印象特別深刻。所以，我們在訪問一些個案時，就會有一些例子、有一些對話、有一些

情景，讓你印象非常深刻。

從每一本書大概可以知道我們進行的方式，以及如何將這些訪問整理成文字稿。在每一本訪談錄裡面，都會把訪問的前前後後做一個交代，也會談到我訪問的一些心得，或者我對這位受訪人的一些想法、看法、簡單的評價，我將其名為「訪問後記」，大概只有幾本我沒寫。因為訪談錄主要都是這些受訪人談的內容，作為主訪人在修改文句、措詞時，不能加入自己主觀的意識，不能把自己的話變成受訪人的話，要將當事人講的還原是他講的，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則。

除了文字稿以外，還有照片。照片的處理方式有兩種，一種是放在書裡和文字相關的部分，排版時會比較麻煩；另一種方式是我後來比較常用的，將全部的照片都集中在書前，譬如用 16 頁或 32 頁的方式來處理，內文排版就比較單純。

(三)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也很重視這一方面的研究。自 1994 年成立口述歷史室，迄 2012 年出版如下專書：《台籍日本兵座談會記錄並相關資料》、《走過兩個時代的人：臺籍日本兵》、《蘭大弼醫生口述歷史》、《坐擁書城：賴永祥先生訪問紀錄》、《代書筆、商人風——百歲人瑞孫江淮先生訪問紀錄》、《曹永和院士訪問紀錄》、《災後十年：九二一地震口述訪問紀錄》，並出版《臺灣口述歷史書目彙編（1953-2009）》，是 1953 年至 2009 年的彙整，是一個總結，大家可以特別留意。

臺灣口述歷史的成效，具體呈現在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臺灣口述歷史書目彙編編輯組在 2009 年 8 月出版之《臺灣口述歷史書目彙編



(1953 - 2009)》。此書收錄戰後以來的專書與單篇文章，分總類、政治、經濟、社會、文化五類；其中，總類又分區域、理論與實踐兩項，政治類分政軍人物、政治事務、政治事件、軍事四項，經濟類分政策與產業兩項，社會類分宗教習俗、醫療衛生、家族、婦女、族群五項，文化類分學術教育、文學藝術、體育休閒。書目總數達5,005條，足以反映戰後臺灣口述歷史各面向。詹素娟在〈編序〉上說：本書目更是臺灣第一本完整收錄口述歷史書目的專書，它完整呈現及反映出過去五十六年臺灣所有參與口述歷史工作的集體辛勤成果，值得學界針對其中珍貴的訊息，從事深入的研究、討論與反省。

談到這裡，應該表揚一下我對香光尼眾佛學院圖書館的讚賞，它出版一些有關佛教圖書館編目的作品，還出版了兩本博碩士論文的提要。對一個研究者或對一個關心佛教史的人來講，這兩本書相當好，讓我們知道戰後臺灣有哪些人做了哪些研究的工作，而且透過簡單幾百字的摘要就可以知道這個人寫這本論文的內容。有一位政大歷史所的碩士生，也是出家法師，有時候會來找我，我鼓勵他研究時要把心量、眼光放寬，找一些很基本的資料好好的讀，像這種書就要從頭到尾翻一遍，有整體的概念，回到研究的問題點時，眼光才不會侷限在那個小點上，而且這樣會透過這個奠基的工作，在未來會比較具有發展潛力。除了這兩本書以外，還可以看大陸出版的《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現在已經出了三大套，另外還有一套是屬於報紙的，透過這四套可以了解過去民國史上，佛教出版了哪些期刊、有哪些人寫過什麼文章，對過去的歷史就會有一些大概的

了解；再回到當下的臺灣佛教、臺灣的社會，對於目前的發展，就會有很清楚的理解，如臺灣佛教目前的優缺點、教團特色等，這樣大家就不會變成盲目的佛教徒。雖然講這個部分有點離題了，但我覺得這也是滿重要的。

（四）國防部史政編譯局（室）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室）的特色是出版和軍事主題有關的書。自2004年起，陸續出版系列有關軍事類口述歷史叢書，如《國軍裝甲兵口述歷史》、《中央陸軍軍官學校航空班：楊鴻鼎將軍口述歷史》、《北斗星下的勇者：空軍第三十四中隊黑蝙蝠中隊口述歷史》、《海軍陸戰隊官兵口述歷史訪問紀錄》、《國軍砲兵口述歷史》、《巾幘英雄女青年工作大隊口述歷史》、《塵封的作戰計畫：國光計畫口述歷史》、《美軍顧問團在臺工作口述歷史》等。2009年出版有：彭大年主編《碧雪丹心：古寧頭戰役60週年參戰官兵口述歷史》、孫弘鑫主編《烽火歲月：823戰役參戰官兵口述歷史》、郭冠麟主編《飛虎薪傳：中美混合團口述歷史》三本。2010年出版《高空的勇者：黑貓中隊口述歷史》及《鐵翼雄鷹：大漠計畫口述歷史》兩本。任何單位都要做與自己屬性相關的主題，做起來比較能夠勝任。像國防部史政編譯局負責出版的軍事類口述歷史叢書，是外人難以取代的，甚為可貴。

五、訪談的程序與要領

（一）依計畫主題建立受訪名單

訪問前的第一個工作是決定訪問對象，這很重要。訪問對象是根據所設定的主題來決定。如果訪問家中的長輩，大概不太需要這麼複雜，因



為只有一個人。像我當時是設定臺灣佛教人物、當代佛教人物，我就必須做這方面的準備功夫。什麼是佛教人物？就是四眾弟子，包括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優婆塞、優婆夷通常我們是用居士來統稱；居士也包括很多在學校或是在學術界從事教育或佛教文化工作的長輩。臺灣佛教界人物這麼多，我們要訪問誰呢？我們是從比丘尼開始訪問，但我對法師認識有限，所以就透過昭慧法師幫忙介紹，慢慢展開，建立一份名單，其中也包括悟因法師。因為考慮時間、效率及所要投資成本的問題，將名單由北到南、由西到東排列。又，如果要訪問一個社區，以紫竹林精舍附近的衛武營來講，也要設定一個主題，如社區的發展史、是和軍事有關，還是和當地文化有關，或者是整個都包括在內。

除了可以請某個人、某位法師或某位居士提供名單之外，也可以透過自己對臺灣佛教史的理解來建立自己的名單。建立名單的原則，是以在當代佛教界有一定的影響力、地位、貢獻，或者對某一部佛經的義理了解特別深、講得特別透徹，或對佛教義理之掌握與研究成果等方面，作為考慮的依據。過去十幾年來，我大概是秉持這樣的原則來做，但有時候也未必能夠如願。例如前面有提到國史館原先設定要訪問星雲法師或證嚴法師，但當我們去接觸時，他們不願意，可能是因為他們覺得不了解，也不清楚你要做什麼。

因為這些情況，我就有另一個思考，可以找一些中型或小型的道場，或是就近的法師、認識的法師，慢慢展開來做。依這樣的標準選定對象後，再逐步一一進行，長期持續下來，就會累積一些成果。例如臺灣有很多小小的寺廟，它本身

可能不留意、也沒有能力處理這些東西，但在當地滿有代表性，且有發揮一定弘化的功能，雖然這些老法師可能默默無聞，但臺灣佛教的口述歷史是可以朝這方面來做的。

有時候我會聽到一些國史館以外的朋友，或是一些學界的朋友，反應國史館做得不錯，因為訪談錄是一系列的、是有特色的。有特色是外面的學界或一些佛教界的法師向我們反應的，我們自己比較沒有這樣的感覺。不過，這樣的反應，至少讓我們覺得做這樣的事還是有意義的，雖然訪問期間會遭遇到一些困難或問題，甚至招來一些誤會。

我也認為口述歷史是有心就可以做得到的事，但有時候不同的因緣就會超出預期。任何事情都是要兩相和合，機緣成熟，才能水到渠成，包括口述歷史的訪問，都離不開這個因緣法則。另外也有一些例子，就是有些佛教界人士知道國史館要做佛教的訪談錄，覺得由國史館來背書，是得到某種肯定，但有時候我也不敢接受太多，因為在訪問的過程或在聯繫的過程中，其實很害怕有「被綁架」的情況發生。有時候在訪問的過程，會有這種感覺，因為與當初設想的有差距。至於這樣的差距就看你如何處理了。剛開始我們去接觸時，對方不太願意；後來我們做多了，對方會說很想由國史館來訪問，但已經過了訪問的最佳時機；就是沒有那麼多的機緣可以讓我們繼續再做。我手邊還有很多存檔，希望在我離開這個職場之前，有機會可以多出版幾本口述歷史的書。通常我的習慣是，我有把握在退休前做好才接這個案子，因為我可能隨時準備要離開這個職場，如果留下這麼多稿子沒有處理，這個事情就



不圓滿了。在我訪問最多的那幾年，大概有一半的時間不在辦公室；以在臺北來講，大概有三分之一的時間在坐捷運。對我來講，整個訪問過程最美好的時間已經過了，現在有機會我就會去分享，鼓吹有心人投入這個工作。

訪問對象要依據整個計畫來設定，目的、目標要清楚，因為目標和整個進行相當有關係。確定訪問主題以後，就要找合適的人。所謂合適的對象，就是對這個地方了解比較多的人。例如耆老們的經驗比較老道，在地生長好幾十年了，很多事情只有他們才知道，而我們要透過他們的經驗，記錄下這裡所發生的種種。像我訪問比較多的是佛教界的人士，我就會思考要訪問的重點是什麼。如果對象是一位法師、一位居士或一位大學教授，訪問的重點也會不一樣。

關於佛教人物的選定，我這裡特別想談的是，他可能沒有很多信徒，只是一個在學校教佛學的學者而已，但是我們覺得他在某一方面是特色的。如臺大哲學系的葉阿月教授，訪談錄目前已經出版了。我們選定她的原因是，她是一個在佛教義理很有研究、有開創性的人。是臺灣佛教界到日本留學，得到博士學位又回到臺灣大學哲學系專任教職的一位居士。她對唯識學的研究，是吸收了日本學界的精髓，研究得很細；如果拿她的著作來看，就可以發現其自學的特色。可惜葉教授大概已經往生三年了，臺北市淨法界善友文教基金會幫她出版一本《葉阿月教授佛學論文集》。這本著作要全部看完可能不是那麼容易，但是透過閱讀這一本著作，可以了解唯識學比較精細的部分。

恆清法師也是臺大哲學系的教授，擁有博士

學位，為人也很低調。透過對她的訪問，我們可以了解她對臺灣研修學院的成立，在幕後下了很多的功夫。印象中，法師曾經提到為了讓法案通過，常常騎著腳踏車，從臺大到立法院，來回的跑，去找王金平、立委說服他們，讓這個法案可以完成、通過。現在 CBETA 已經做得愈來愈好了，但 CBETA 的開始，恆清法師也發揮了很大的作用。好幾年前，香光尼僧團的悟因法師曾經貢獻 100 萬給臺大佛學研究中心，給恆清法師做事情。後來好像由仁俊長老認識的一位在美國的企業家，捐一筆很大的基金給 CBETA，可以長期運作。CBETA 主要的奠基，是恆清法師當時找杜正民教授，前一陣子得到教育部特優人員獎，在 CBETA 裡面做了很多的幕後工作。我們也曾經訪問過杜老師，記得訪問他是一天。那一天我們安排在新北投的中華佛研所，上午訪問 2 個小時，下午訪問 2 個小時，整理出來的文字稿，字數不少，先刊登在國史館的館刊，後來又結集在《臺灣佛教人物訪談錄》第二冊。杜老師後來也說，如果要他再重新講，也講不出來了；惠敏法師同樣也提過，他不記得過去訪問時講過哪些話，只有在我們訪問的當下，他才講得出來。惠敏法師、杜老師、恆清法師或李志夫教授，在他們的訪談錄裡面，多多少少都有談到 CBETA 成立前後相關的事情，如果幾年前沒有留下這些資料，他們自己也未必有心寫下來。所以，如果要了解 CBETA，透過我訪問的這四位，有法師、有居士，也有教授，基本的輪廓大概就有點概念，因為他們是當事人，而且在好幾年前就訪問、記錄了。

針對不同的個案，訪問的情況也會有不同的變動。以一個人的經歷來講，七、八十歲的閱歷



是比較豐富的，而且也比較有空，如果他願意講，而且趁著他記憶力好的時候，可能是一個很好的訪問對象的年齡。以我個人的經驗，很多事情在因緣條件許可的時候，就應該要趕快做。如果是訪問一般家裡的長輩，而且已經退休了，他的記憶力還好、身體也還不錯，就要趕快把他錄音下來，否則可能就沒有機會了。像我有一個同事去訪問以前的糧食局長李連春，他是戰後初期很有名的人物。第一次去訪問時，覺得好像很有收穫，可以訪問；可是第二次、第三次去訪問時，談話的內容都一樣，後來他們就停止訪問了，因為年紀大了，記憶力也衰退了。所以，年齡的大小也是一個考慮的因素，但就年齡來說，以年紀愈大的為最優先，再者應以記憶好的人為優先。

選擇訪問的名單確定以後，再來是要考慮優先順序的問題，如年紀大的、腦筋還清楚的優先；如果你還知道這些對象的背景，我的建議是，為了讓自己比較有信心，可以先找教書的、會寫文章的、會寫書的人，因為你一問，他就會講很多。如果找到這樣的好對象，就很輕鬆愉快，甚至後面整稿的部分，就可以很放心了。像我訪問惠敏法師，後來的稿子是他自己整理的。訪問的過程，從開始一直到最後，講起來很簡單，但如何去運用，怎麼樣做最有效的運作，其實也很重要。

(二) 設計相關的問題（訪問大綱）

預先設計相關的訪問大綱，有一個基礎，目標就不會走偏了，在進行時，心也會比較篤定。除了可以提醒不要離題以外，清楚整個脈絡，對於後面文字稿的整理，也有方便之處。不過，有時候我沒有特別設定訪問大綱。例如我們曾經準備要訪問華梵大學的創辦人曉雲法師，他要我們

提供一些題目，我們洋洋灑灑的列了訪問大綱，但後來對方沒有回應。

訪問的對象、主題，不論是佛教的或是受難者的，對象都是人，都是有其生命歷程。我不把訪問對象當成是一個主要的分別，因為凡是有喜、怒、哀、樂。口述歷史的對象不同，所要準備的也不同，但它有一個共同的方式，就是在操作過程中，有其共通性。所以，主要的方法掌握了，不論訪問什麼題目或對象，都是可以的。例如前幾個月我做得比較多的是白色恐怖案件的訪問，這是因為有學界的朋友向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申請一個口述歷史的計畫案，我就參與了。佛教與白色恐怖是兩個完全不同的主題。訪問白色恐怖案件的女性受刑人，談他們的經歷、談他們的長輩或先生，在遭遇政治案件迫害時，他們是如何走過來的。這個計畫的重點，是訪問他們生命的歷程、生命的過程，比較屬於悲慘的那一面。（這個計畫在 2015 年 5 月完成，由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及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共同出版《獄外之囚：白色恐怖受難者女性家屬訪問紀錄》上、中、下三冊）

要呈現一篇有脈絡的口述訪談，除了個人生平外，還需要針對個人的相關履歷、社會脈動、親友關係，甚至對某些政治事件的觀感、特別的見聞，進行深入訪談。我們去訪問時，會希望受訪者先簡單介紹他的出生、家庭、佛學背景等，隨著他整個生命歷程，請他慢慢敘述，再扣緊我們所需要的主題來談論。其中會涉及他個人的學思歷程、他對社會的看法或所親近的親友等等。對於政治態度，如果是白色恐怖的案件，會比較偏重；如果是對佛教人物的訪問，可能就不是那



麼重要，但依我研究佛教史的心得來看，政教關係很重要。自古以來，政教的關係也是佛教歷史的一部分，歷朝歷代政府的宗教政策，對這個宗教在這個時代的發展，具有相當重要的影響力。這是屬於個人較為隱密的部分，但有時候也可以請佛教界的人士來談對政治的一些看法。

我在十幾年前，為了蒐集有關佛教史研究的資料，都會去一些展覽館，或特別到一些寺院去看看，也曾經受邀參加了好幾次學術會議，和大陸一些佛教學者做一些交流，特別留意他們的研究成果。在這個過程中，我發現雖然改革開放以後，大陸佛教慢慢的擺脫了政治的影響力，但是到目前為止，政治的影響力還是很大，這和臺灣很不一樣。臺灣在解嚴之前，宗教也一樣受到政治的影響，如果將兩地佛教發展做比較，就可以看出它軌跡先後的不一樣，我們可能早二十年或三十年；就政治層面來講，大陸經濟雖然發展很快，但政治的控制力還是很強的，政治對大陸佛教的影響程度、影響面，比臺灣來得更大。又如我參加白色恐怖政治案件受刑人的訪問，因為是屬於政治方面的人物訪問，所以會特別問他對目前臺灣政治的看法、政治的傾向；一般來講，如果有長輩受過政治迫害，都會比較傾向綠營，但也未必全部都是，有的人是屬於比較中立的、有的人是有一點偏藍。訪問時，這一點也可以作為考慮的依據之一。

如何設定訪問大綱？以臺灣佛教人物為例，我通常會請他們談下列幾項：接觸佛教初緣、出家與受戒、修學與參學、寺院與信徒、法門師友等。這幾項可以視為主軸，依照訪問對象的不同，也會有不同的設定。例如訪問養慧學苑的法師，

我大概會想了解養慧學苑是什麼時候建立的，是怎麼樣因緣，如土地、資金來源，或是這個地方的信徒的共同參與；哪一位建築師、哪一個機構對這整個房舍的設計、規劃，投入心力；蓋好以後，有哪些法師長住這裡，或是透過本山的輪調運作；這裡的信眾如何與法師互動，如開設哪些課程，因為香光尼僧團是非常重視文化、教育的，透過課程與大家展開一種互動；資金來源是不是有大護法，還是一些小資慢慢累積；有沒有定期的法會活動，如梁皇懺、觀音聖誕等；還有這幾年的成果、可能遭遇的問題、與地方政府機關（除了民政局以外）的互動、選舉時有沒有成為候選人跑場的對象；學苑與本山之間的關係、和其他分院道場的關係；學苑和佛光山、密教、法鼓山或是慈濟的寺院之間的競合關係、互動關係等等。因為我長期的留意和研究，作為一個第一次到這個道場、對當代臺灣佛教史非常有興趣的我來說，會想了解這些。如果針對個別的法師來講，我會想問他出生、整個生活背景、學習、與佛教因緣最深的法師、為什麼來到這個寺院（道場）、專精是什麼、所學是什麼，例如有人喜歡研究經論、有人喜歡教書、有人對於經論（如《百法明門論》或《成唯識論》等）特別有興趣；如何和信徒互動、最有心得的部分，同輩、師友之間，是如何與他們互動；你和哪一位法師最好，我想這個都很正常的。針對某位法師來講，以他本人為主，如何向外展開法源關係與人際關係；就時間上來講，他的生活背景，從小一直到現在。透過這樣的訪問、分析，就可以了解這位法師或這個道場，在這個地區或在整個臺灣佛教的定位。談到定位，可能還要再看其他人的說法，或是其



他的記錄。

(三) 訪談進行時的相關問題

有了名單，也大概知道如何去訪問後，接下來是到現場如何進行的工作。有關訪談進行時的相關問題：

1. 約定時間

一定要準時抵達。不過，我通常會早到，但不是馬上去按門鈴，因為訪問人不能早到，也不能遲到。凡事無法意料，預想的可能會有意外，事先要把可能發生的意外狀況都列入，如高鐵停電了等等。如果提早到達，可以先在附近散散步，了解一下環境，時間到了再去按門鈴。

2. 訪問地點（場所）

最理想的訪問地點，要安靜不受外界干擾，才適合談話。如果訪問的地點是在寺院，像法師的會客室或辦公室，是比較安靜的空間，就很理想。要比較安靜的原因，除了要進行錄音之外，主訪人和受訪人也能比較放鬆自在。因為唯有在比較安靜、祥和的環境，氣氛好，訪問的內容才能從容、深入。例如上個月我到龍潭去訪問一個個案，他是開餐廳的，訪問 2 個小時下來很疲累。因為訪問時要很專注的問和聽，又要和受訪人保持良好的互動，如果旁邊的環境很嘈雜，就需要很費心力。口述歷史是一種對話，對話的內容要深入，心的頻率要很靜，才能談下去，否則會很膚淺。所以，到一個準備要訪問的地點時，一定要先問受訪人訪問地點在哪裡。如果家裡有兩、三歲小孩或寵物，像我曾經訪問過一位編舞的人，他養了五、六隻貓，在訪問之前，他會先將這些貓關到樓上房間，不干擾訪問的進行。因此，

為了要讓整個訪問的效果、效率比較好，這些因素都必須考慮到。

還有一個很有意思的訪問個案，我訪問的一個對象是受刑人的家屬，結果他有兩個兄弟、三個妹妹、還有一個媳婦，每一位都是受訪人，而我是第一次和他們見面，誰是誰也不清楚，只好指定大哥、二哥、大嫂、大妹、二妹坐的位置，拋出一個問題按照座位順序讓他們講。否則回去之後，稿子幾乎沒辦法整理，因為你還要整理出什麼人講什麼話。這是事前要先考慮到的。當然，一般我們不會碰到這麼複雜的，最多二位或三位；如果更多人的時候，就得將這些因素都考慮進去。不是光談一談就好了，後續還要做整理的工作；尤其是要將聲音轉成文字時，什麼人講的就要很清楚；如果是留存影像，就沒有這方面的問題了。

3. 應準備的工具

訪問時，紙、筆、錄音及錄影設備，都要準備。如果要錄影，還要考慮電源的問題；錄音則需要考慮錄音帶和電池的問題。紙、筆可以寫下一些備忘、受訪人的基本資料、要發問的問題，或是在訪問過程中，要繼續問的問題，都可以記下來。在訪問過程中，有時候我們不能馬上再問，因為這樣會打斷受訪人說話，這一段話有可能是今天最精彩的部分，但是因為你不當的插問，這一段話可能就沒有了。所以，什麼時候再問，這一點很重要，這是一個經驗的問題。此外，對訪問的主題要相當的明確，訪問的對象也不能太陌生，要對他有一點了解，才能夠問出很精彩的那個部分。

還有一個狀況也要注意的，我印象中大概是



十年前，有一次從臺北到彰化去訪問二二八事件的受訪人，前一天晚上我先將錄音帶準備好，電池裝好，也測試錄音。可是到訪問的地點發現，錄音機不能運轉，原因是錄音機放在包包裡面，不小心壓到電源，結果電池用完了。這也是事先要考慮到的情況。為了保險起見，我通常會準備4部機器，2部錄音機，2部錄數位的錄音筆，雖然不一定全部都用得上。所以，凡事要設想周到，把握時機，當下就把它做好，才是最重要的。

4. 訪談時間

訪問的時間，以2個小時左右為宜。一般早上9:30開始，下午2:00以後的時段為佳。訪問中，可以視情況休息一下；尤其是對八、九十歲的老人家，可能訪問十幾分鐘就要讓他休息。老人家旁邊可能會有侍者，事先都要把情況了解清楚。例如國史館曾經訪問一位外交部部長周書楷，在有一次訪問了以後，那天晚上回來就聽說人已經往生的消息；後來我們同事有提到，當天周部長講得很激動。如果是連續講了很長的時間，再加上如果有高血壓，可能就會因為這一次的訪問而造成不幸的事情。這也是我們要特別留意的。尤其是受訪人講到激動的時候、最有感觸的時候，主訪人要有一些適當的應對，免得因為我們的疏忽，造成一些無法挽回、不幸的事情發生。

所以，訪問的時間，一般是2個小時為原則，但有時也會視情況而定。如果受訪人的身體特別好，中間也不一定要休息，也不限於2個小時，有時可以延長為3個小時。像我們訪問吳老擇教授的時候，就是採連續的方式，有時候我從臺北到元亨寺住宿，安排早上、下午各訪問3個小時，連續幾天，訪問就全部完成了。

還有不要讓受訪人覺得壓力很大，這個也很重要。訪問的時間通常是上午9點或10點；下午的時間，如果老人家需要休息，就要給他足夠的休息時間，不要影響到他平常的作息，有狀況隨時可以停下來。口述歷史雖然很重要，但也沒有重要到要影響到其他人。

5. 可考慮攜帶禮物

訪問時，可以帶點禮物，如主訪人的作品，尤其是口述史相關的作品，或單位機關的出版品。像我們有時候就會帶一些國史館口述歷史的出版品。但是送東西也要考慮接受的人的想法和感想，例如我要訪問一位法師，有時候我成稿大概只要二、三萬字就好了，可是我卻帶了一本個人訪談錄的書送給對方，對方看了也許會有你小看他的想法。又如後來有些受訪的法師、居士都會覺得就是想要出版一本書，但當初我們只設定要訪問兩、三次就好了，這又有我前面談到好像有點被綁架了的感覺，真的是很微妙。

（四）訪談進行中要面對的問題

訪談進行中可能面對的問題：

1. 受訪者情緒激動，或大量批評他人時，如何處理？

訪談的過程也會碰到一些問題，如情緒激動，還有一種是講別人的缺點。這時要如何處理？就我的訪問經驗是，訪問對象情緒會比較激動的，通常是過去整個成長過程特別困苦，或是剛出家沒多久被師父修理得很厲害，想起來就很傷心。這時候可以先停止訪問，遞個衛生紙，等受訪人的情緒平穩了再繼續訪問。因為這個部分的訪談內容可能是很重要的，可以展現他內心深處



的部分，否則受訪人的情緒也不會那麼激動。另外，如果是遇到批評其他人的情況發生時，我們也不需要加油添醋，只要安靜的聽聽就好了。我後面會談到一個運用佛法來做佛教口述歷史的原則，也就是無我的原則。我們只是一個去創造讓對方儘量講出他心裡話的角色，所以不要涉入太多。

2. 除了受訪者之外，還有其他的家屬或朋友在場，不時插嘴，干擾到訪問進行或錄音工作。

如果有受訪人的朋友或家屬在場的時候，他們可能比受訪人說的話還多。這時候該怎麼辦呢？如果已經干擾到訪問，我們就要做一些言辭上的規範；如果是有一方身體情況不好，在旁邊作為輔助說明，就另當別論。例如我們訪問的法師，有時候會把他的徒弟支開，這樣師父也比較自在，這是我的經驗。因為師父和我們是第一次見面，可能有些話對我們講沒有關係，但是徒弟天天見面，有些話可能就不想講給他們聽，這也是一種很有趣的情況。還有訪問一般的對象，例如訪問白色恐怖的家屬，有家屬在的時候，受訪人有時候也會有一些顧忌；不過，有家屬在也未必沒有好處，因為有時可以適時的提醒當事人可能講錯了。這也是原則，怎麼去利用，因人而異。

3. 受訪者在有些部分因記憶模糊，可以提供相關文件、照片勾起回憶。

訪問時，我們也會請受訪人提供他個人的一些資料，如相關的照片、日記或書信。照片是一種很不錯的史料，像有些是好幾十年前的照片，有些是日治時代的照片，現在看起來非常難得，可以將當時的一些人物、情境或建築留下來。文字、錄音當然也是重要的資料。現在寫信的人大概比較少了，E-mail 可能比較多，而 E-mail 本身

也可以當作是未來的史料。像我習慣把大部分的 E-mail 留下來，因為 E-mail 上有發送和回應的日期。這十幾年來，我接觸好幾十位的法師或居士，和他們交往的過程，大部分是透過 E-mail 聯絡，所以我會將它當作是一種未來可以用的資料。如果法師有受戒的戒牒，也可能是一種很好的資料；還有像照片、書信、文件，或是個人的、寺廟的一些登記等。對一般人來講，如有些家產的登記，可能未必適合曝光，但是有一些東西就是很好的資料，都要一起收錄。所以，如果受訪者有記憶力模糊的情況，或許可能因為提供的照片，而講出很精彩的一段過去。

4. 受訪者所說，常出現以偏蓋全，太過於主觀。

我並不認為受訪人講的內容完全都是客觀的。因為主觀是必然的，但是主觀的後遺症是會招來一些抗議。這個抗議有時可能是直接針對主訪人，有時可能會針對受訪人。像國史館出版這些佛教人物傳記，受到一些負面的反應或批評，都是和受訪人的主觀角度有關。被批評的這些人或其他的團體會抗議，是因為把我們講的內容看得很嚴重，但這是一種自我保護或自我意識在裡面。而我應對的方式是，我們承認任何一個口述歷史，都是受訪人的主觀陳述。為了避免一些爭端，比較好的處理方式是，在正式發表之前，要先對一些比較有爭議的問題做一些考慮，是不是要多元呈現，或是用婉轉的方式呈現，否則出版以後就來不及了。

（五）口述訪談後的整稿問題

整稿也是一個大問題，牽涉到整個訪問的成敗，也關係後續整個運作的情況。如果從來沒有



做過整稿，我強調一定要自己整幾次稿，因為它是一個很好的訓練。整稿時，在文辭上還是要做一些必要的修飾。一般的整稿大概有三種方式：

1. 一問一答的方式

這種方式最簡單，比較容易整理（接近原音重現），且可讓讀者了解主訪人的問題意識及受訪人的臨場應變，但可讀性比較不高。一般人類學家進行田野調查時，較常採用這一種。作為資料來講，它可以呈現當時雙方對話的情境，但是一般讀者大概沒有耐性閱讀這些資料。

2. 打散訪談記錄，按內容歸類，再下適當的標題

這種方式最方便閱讀，但很費工。處理方式是，第一步先整理原音呈現稿，再根據文稿的內容進行整修，之後再加上標題。過去國史館或歷史學界大概是採用這種比較費工的方式。如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臺灣口述歷史書目彙編（1953-2009）》，蒐集了五、六千筆的書目資料，就是採用打散的方式整理的。也有少數是例外的，例如我訪問明聖法師的時候，訪問的重點並不是明聖法師本人，而是要透過明聖法師來了解印順法師，因為他長期在印順法師的旁邊當侍者。在他當侍者的這段期間，尤其是在臺中華雨精舍建設的整個過程，當時就考慮用一問一答的方式來呈現。

另外，可能在國史館出版的這些書裡面，也有部分，幾頁或幾段，是用這種方式，但大部分還是全部打散在各章節裡面。有時候一部分用問答的方式呈現，在閱讀時，反而可以凸顯臨場感。所以，也不一定是全部都打散，即使是一、二萬字的稿件，覺得有幾個問題、幾個段落要顯得特別生動、活潑，具有臨場的親切感，就可以將這

部分留下來，採用一問一答的方式呈現；短篇的也可以。如果是故意這樣做，就要考慮到整個章節、段落的安排，讓整篇文章看起來不會很奇怪。有心從事口述歷史的人，自己一定要先做記錄；唯有經過做的過程，才能夠知道怎麼樣讓自己的訪問技巧更好、更理想。所以，我們也鼓勵大家整稿，做章節編排、文字整理的工夫。

3. 混合上述兩者

即採下標題、重整方式，但在重要問題時，採用一問一答的方式呈現。不論是一本書或一篇文章，都可以採用這種方式。

此外，找誰整稿也很重要。有一種情況是，如果這個法師旁邊有一個得力助手，而且文筆也還不錯，就可以請法師的徒弟來整稿，因為找其他人整稿，法師可能不滿意。如我們曾經有將整好的文字稿交給對方看，但對方卻很不滿意的經驗。因為人是很主觀的，好壞有時候很難判斷，雖然我們很用心，但對方看了以後不一定會滿意。

（六）如何掌握訪問過程

1. 引導式的談話技巧

如何去問問題，也是很重要的。要能主導訪問過程，這與整個訪問過程能否順利進行，關係密切。我一直強調去訪問的人有主動權，主動掌握整個訪問過程的權利。針對受訪人設計一些合適的問題，要怎麼問，權利在我們；要掌握主題，不要自亂陣腳。因為訪問不是一般的閒聊，是針對某種需要而進行的。一定要針對問題提問，再針對對方的回答，思考如何對他所提的內容進一步做必要的追問或詢問。

前面有談到，為了讓整個訪問不偏離主題，



要設立一些訪問大綱，再根據大綱來問問題。但是大綱也不是一成不變的，有時候不在大綱裡面的引發問題，可能更為重要。這些問題的發掘，是要事先做一些功課，在臨場時，也要能夠適時用引導的方式，請受訪人談出一些我們要的內容。一方面，可以主導整個訪問的過程；另一方面，也可以提高整個訪問的品質。

2. 不偏離主題的對話

整個訪問都要在不偏離主題的範圍，才能提高有效度。一般人的談話通常不會很具有邏輯性，有時候會偏離主題，這時不一定要馬上拉回主題，但如果談得太遠了，才考慮這樣做。如果受訪人重複太多次，要很有技巧的將話題引開，這要看臨場的情況，做一些機智、彈性的運用。有時候或許會覺得受訪人談得太遠了，可是後來你會覺得所談的內容，其實是超乎當時的預期，而這些東西可能是更重要的。如何提高有效的對話，達到更好的訪問成效，整個訪問過程的問答是非常關鍵的。

例如 2013 年我在香光尼眾佛學院做一個口述歷史的訓練，其中有學員去訪問時，受訪人談到很關鍵、很精彩的部分，就不談了。怎麼辦？首先，要問他為什麼不談了，將這個問題了解清楚，大概就知道要如何去處理這個情況。有可能讓他談，也有可能他根本就不想談，不論你怎麼做都沒辦法達到。一種理解的方式，是你和他的交情不夠，對你不夠信任。所以，訪問要達到很好的效果，有時候要靠一些交情，有時是要取得他更多的信任。有一些方式可以去運作，但誠心還是很重要的，你以誠對人，對方通常可以感受到的。

3. 插話或不插話（轉移話題的適當時機）

不當的插話有時會壞了整個訪問的節奏，而且會漏失掉很精彩的部分。什麼時候該問、怎麼問，其實都是一個訓練或熟練的問題。如何拿捏，有時是靠個人的經驗，並不會太難。

（七）注意訪問過程中的互動

1. 訪問是「人際互動」的場域

訪問是「人際互動」的場域，是一種互動的過程，進行的過程中需要相互尊重。要如何讓這個過程有效呢？除了事前的準備外，再來是臨場的運用。我將整個口述訪問認定是一個人際關係的互動，在這個社會上，大家脫離不了整個人際關係的互動。人際關係怎麼樣互動好，我想大家都知道這個基本原則——以誠待人。你將以誠待人的方式運用到口述歷史訪問過程裡面，即使過去沒有做過，大概達到理想的目標也不會太遠了。

口述歷史其實也是一個交朋友的好機會，是一個試驗的場所。在訪問之前都不認識，只是透過電話約定，對於沒有交集、不認識、沒談過話、沒見過面的人，如何在第一次見面就讓他信任我們講出很多內心話？就是要在訪問的過程中，讓他感覺我們很尊重他、他是很重要的。一個善於提問的人，會讓對方覺得你很尊重他。所以，有時候講話要稍微留意一下，如果不小心講錯了，可能就沒有辦法彌補。例如曾經有某個單位在電話中和我談事情，我不認識他，沒有考慮就答應對方，還請他發公文來，後面就很難收拾，因為公文來了就要做決定回覆，可是我沒有決定權，就必須請示我們長官；另外在某一個學術場合，我把一個學者的文章講得不如預期或他講得很不好，他甚至還向我抱怨說讓他很難做人，但我講



的話已經無法收回了。

口述歷史是一個談話的過程，也是一個雙方交談的過程。口述歷史有一個目的性，是為了要蒐集受訪人的生平、生命歷程，才進行的訪問工作；也就是讓雙方的談話過程圍繞著整個主軸，順利的展開進行，不要遺漏重點，達到我們所要的目的。我個人的經驗是，如果大家從來沒有做過口述歷史，一種可行的方式是，第一次要跟著一個有經驗的人去，就好像母雞帶小雞的方式，不要讓一個生手直接面對一個在某個領域有專長、特殊貢獻的人物。經由學習、觀摩的方式，幾次以後，自己就可以做了。最好是不要單獨一個人，因為如果對方也是一個人，訪問中可能會有一些空檔。如果有三個人，兩個訪問人、一個當事人，在講話的過程中，可以發揮的空間會比較多，也比較不會有尷尬的時候。即使是一個很有經驗的主訪人，在訪問的過程中，也會擔心要如何和訪問對象有一個很好的互動，什麼時候該提出進一步的問題。如果有兩個人或是搭配一個有經驗的人，在整個運作的過程中，就會比較順暢。所以，我的建議是，一開始如果有一個有經驗的人可以跟著去，訪問的成效會比較好。我第一次的經驗也是跟著一個很有經驗的現代史研究所的教授去做口述歷史，並親自整理文稿；慢慢的學，後來我就可以帶領別人去訪問，因為沒有時間，有很多文字稿都是請別人整理的。

口述歷史是一個團隊合作的成果。很多事情不是單獨可以成就的，要由很多人共同來配合；個人很難做的普及。其中牽涉到一些時間、資金投入的問題；如果考慮到出版，還需要加入更多的因緣。個人大概不容易單獨去承擔這樣的事，

所以香光尼僧團有心做這件事，大家有意願，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2. 受訪人的經驗值得重視、學習

基本上，我將訪問當作是一個學習的過程。佛門的居士或者法師在佛教界都有一、二十年或二、三十年，甚至更久的歷史。他們對於佛法的認識、對於義理的了解、對於教界的貢獻，都可以作為我們參學的參考。我有一個比較特殊的是，除了上面所談的這些外，我會把自己當作是一個旁觀者的角度，研究整個立場，來做佛教的口述歷史。很難說這樣的角度、這樣的態度好不好，但這也是一種方式，就是暫時跳開某一種立場，或許是站在一個比較客觀的角度來做。我們有一位一起做的同事，他說有位教授要他去皈依聖嚴法師，他就說不行，因為皈依了就會納入他的門徒、幫派，幫派是嚴重的，這樣你到其他地方，人家會說你是某某山的、你是哪一個教團的，會有這樣的情況發生。雖然我們講求無我，打開這個界限，但到底這個世界上的聖人很少。

3. 由他人的生命來反照自己

由他人的經歷來看自己，透過閱讀佛經或者透過法師們的講經，來了解佛陀所說的道理，是一種方式。透過深入去了解修行人的生命歷程，也是一種方式。我過去所做有關佛教的口述歷史，也是用這樣的一個態度來從事、來進行。

4. 訪談可以是一種關於生命史的探索

德國哲學家狄爾泰 (Wilhelm Dilthey, 1833-1911) 說：「如實地理解人的生活、生命，這就是人們今日的任務。」「如實」其實是很不容易做到，不加油添醋、原原本本的理解到，作為一個人存在的生命意義，還有他的價值是什麼。有一點抽



象，但又很實在，我們每天都要面對這些。

個人是社會上最基本的單位，是「歷史的原始細胞」。「生命關聯體」是由生命整體及其對象聯合構成的網絡。透過個人來了解外界，訪問可以讓我們了解他人的生命史，回歸到自己作為一個參考。有時候有人會鼓勵我們要讀一些偉人的傳記，訪問一些人了解他們的生命，也是有這樣的一個作用存在。了解他人才能夠了解自己，了解這個世界；反過來說，了解自己才可以了解他人，了解整個外在的世界。

此外，也可以把訪問當作是一種心理治療。即使是微不足道的人，也有一些可取的地方，透過訪問他們，可以了解我們對他的尊重、關懷，對他所經歷的時代的重視。透過訪問，讓受訪人有機會講出內心話，而且這種內心話不是隨時可以講出來的，剛好我們創造了這個機會，也可以藉這個機會去了解他個人的生命史，了解他對這個家庭的重要性和貢獻。在心理層面，如果有機會讓別人對他肯定一點點，他就會覺得這一輩子沒有白來，還算是一個有用的人。

5. 關於深度訪談

R. Sennett 在 *Respect* 一書提出，深度訪談與民意測驗者之提問不同；為了探尋，訪談員不能冷酷無情；為了獲取回應，不得不說出一些自己的事情。而且會話會朝著一個方向展開，此與朋友間的對話不同。訪談員有時候會發現，自己已經越过了只有朋友或親密的人才可能跨越的底線。談話的技術包含調整社交距離，要讓被訪者不會感到自己像是在顯微鏡下被觀察的昆蟲一樣。

口述歷史要能夠很精彩，一定要深度的訪問；如果只是他個人的簡歷，這樣的訪問稿可能

比較沒有意義。這個人的生命歷程在哪個地方發生了什麼作用，透過訪問把它記錄下來，我覺得在這過程裡面，收穫最大的可能是參與的人。深度訪談可以幫忙做到這一點。但是要能夠進入比較深度的訪談，也要知道自己對這個人的了解，或是受訪人他有沒有辦法打開心扉，談他最內心、最核心的那一部分，因為這一部分對他來講可能是不方便對外公布的。就我們去進行訪問的人來講，有時候好像會踩到這樣的紅線。過去我的訪問經驗也曾經發生過這樣的情況，就是有時候會不由自主的問了這個問題，但是事後會覺得或許當時不該這樣問。這是個人進行深度訪談的過程裡面，可能會慢慢體會到的。

6. 順便蒐集相關史料

前面有提到，訪問不是只有和受訪者說話，一問一答，務必要順便蒐集相關史料，如日記、書信、證書、照片、影音等資料。在我們進行訪問的過程中，出版的書裡面，通常也會有這些資料，尤其是照片。日記的部分，有時候是可遇不可求的。像蔣介石的日記現在存放在美國史丹佛大學，是由蔣方智怡將它送到那裡的。這日記裡不僅涉及蔣介石個人，而且還和整個中華民國的發展很有關係，臺灣及中國大陸的學者、學術界很多人想要研究的，都要到史丹佛大學去看這些日記。佛教界很多的法師、大德或許也有寫日記的習慣。如果是半世紀之前所寫的資料，我們現在看起來就會相當有意義。所以，了解過去的歷史，它的價值有時候是很難加以忽略的。不論訪問的對象是誰，要記得看看他們手邊有沒有留下這些資料。



7. 訪問稿出版問題

訪問稿在公開出版前，需取得受訪人同意。如果訪問記錄已經整理了，要到某一種程度才可以送出去，否則被打回票就很難堪了。我記得有一次把一份書稿送給一位老和尚，過了好久都沒有下文，我就透過其他朋友去了解，得到的回答是我們把老和尚寫得不夠偉大；後來我們就再透過這位朋友與老和尚回報說，口述歷史就是我們根據你所講的內容寫出來的，通常是以第一人稱來行文敘述。老和尚知道口述歷史的特性後，才覺得可以出版了。有這樣一個經歷、這樣一個故事。

又如訪問惠敏法師，他是博士、學者，也是電腦專家。我們雖然已經請人整理了文字稿，即使我花了功夫去準備，把訪問稿好好的改，可能他也不會滿意。所以，我就讓惠敏法師自己整稿，這樣我就很省事了。因為我們有初稿，而且原來找來整理初稿的人就是法鼓山的信徒，每次訪問時都會到，也都認識。所以，對於學者型的受訪者，拿初稿給他整理，可能很快就完成了。另外像李志夫所長也是用這種方式。如果是元亨寺的菩妙老和尚，他的專長不是在文字上，你問十句，他才回答一句，就沒辦法這樣做了，就要用另外一種方式去做。

所以，口述歷史從訪問到出版，背後有很多種不同的方式，會因為訪問的對象而不同。最好的方式，就是如果受訪者是學者、老師，後面的處理就簡單了。像恆清法師的訪問，也是有了初稿以後，再整個全書稍做一些整理，後面也是交給法師自己做。當然這也會有一些問題。所謂問題，就是我們覺得應該可以刊出來的，受訪者覺得不好就把它刪掉了。

口述歷史要出版的時候，一定要當事人同意才可以出版，而且要簽名蓋章，甚至還有一些契約。如國史館最近和幾位將軍的後代接觸，如胡宗南將軍的兒子胡為真、吉星文將軍的兒子吉民立、陳誠的兒子陳履安等，他們都有日記，準備 2015 年由國史館出版，因為 2015 年是抗戰勝利七十周年。由於當事人不在了，出版前，我們必須取得他們家屬的同意，如出版陳誠的日記，要取得陳履安和他的兄弟姐妹的同意，才符合法律的要求。

8. 是否要將訪問錄音錄影帶公開？

進一步要將錄音帶或錄影帶公開，也是要取得受訪人同意，且需留意是否會觸犯隱私與違法的問題。如果要將受訪的影片，放到網路上公開發行、流通，沒有經過受訪者的同意，也會犯法。在臺灣法治愈來愈進步的時代，都要留意這方面的問題。

這裡的問題主要是因為會涉及到第三者的隱私。以我的經驗，佛教界受訪的人大概比較在意的是財產方面。例如我們曾經在一個訪談錄提到有位法師離開某寺的時候拿了幾百萬，這件事情我們刊出來以後，這位法師知道了就來抗議，這是一個例子。另一個例子，我們也在某一本某一篇的訪問提到，某位法師把他原來在某處的寺院賣掉，得了幾千萬，然後那位法師有一次就打電話來說，他因為這個事情被黑道恐嚇。錢不露白，如果訪談的內容有談到這些事情，都要相當留意。因為這是他人之事，你講出來，我們可能不覺得怎麼樣，或是講的人也覺得不會怎麼樣，但是被講到的人或許就覺得會很嚴重。

此外，錄音帶、錄影帶的保留可能比文字稿更原始，因為文字稿已經過整編或者刪減，將一



些比較敏感或不妥的部分刪除、修改。如果錄音帶、錄影帶要完整呈現、公開發表，可能要針對講的內容做一些解釋，必要時可以將有爭議或不妥的部分刪掉、剪掉，才不會有負面的影響出現。這是事先要做的，否則現在網路這麼發達，一旦公布出來就無法收回了。

9. 依「三法印」原則來從事佛教人物口述訪問

談一個我個人的體會，三法印是判斷佛法的一個標準，很重要的一個原則。這個原則也可以用在口述歷史上。

(1) 「諸法無我」法則

諸法無我的原則，用在口述歷史的時候，可以貫穿整個口述訪問的過程，佛教人物口述訪問是否能有成效，繫乎主訪者與受訪者能否「兩相合和」？從開始的擬訂名單、設定訪問的主題，正式訪問之進行，到訪問後的整稿及出版工作，訪問人在基本心態上，都要排除以「我」為中心的想法。不要把自己看得太偉大，你只是其中一個螺絲釘、一個促成人，讓這個事情能夠成就的一個隱遁的小角色而已。例如在訪問時，主訪人不要表達太多自己的意見、經歷或想法，主要是要讓對方多講一些我們要的內容，這與一般言談的性質是不一樣的。在訪問進行時，要能適時、適當地「導引」受訪人，讓受訪人講出其一生中投入最多，最有心得的那一部分，在這些過程中，都要秉持「無我」的精神。主訪人要以「無我」的心境，讓受訪人就著設定的主題暢所欲言，才能讓口述訪問的內容充實又精彩。

在此要特別強調一點，就是整稿時，也要有無我的精神，要能順著主訪人所談的理路與脈絡修改，不能照著自己的意思，喪失或歪曲主訪人

的談話內容，讓這個訪問稿能夠比較通順，讀者能夠讀下去。在整稿的過程中，因為有時候人們講話不是那麼連續，中間會有一些斷掉的部分，是可以用自己的話接起來，加上一些轉折語，讓文字稿通順，但不能加入太多自己的經驗、想法。整稿時，原音呈現有它的好處，但整理出來的資料，為了要讓讀者能看得懂、有興趣繼續看，也不能喪失原來受訪人的意思。整稿的人是可以做一些必要的補充，但不能取代受訪人所講的，因為這和自己個人的寫作不一樣。為人作嫁雖然不好聽，但口述歷史就有這樣的性質在。

因為整稿會牽涉到整個口述歷史的成敗，或者說是你的業績、成果的問題。如果只是訪問而沒有出版，就有點可惜，當然有這個訪問的經驗也不錯。像剛剛自衍法師提到，我們在香光尼眾佛學院推展那一次訪問以後，只有一篇被刊登出來。因為沒有後續推動的力量，有一些訪問的資料就被擋著，其實是滿可惜的。如果能夠讓訪問的資料完全呈現，累積起來，積少成多，對於整個佛教或者佛教史，應該會有一些貢獻。

出版過程中，同樣是用這樣的精神，也要與受訪人或相關參與人充分溝通協調，才能將訪問稿完美呈現。和受訪人有很好的聯繫，經過受訪人同意才可以出版。我們也看過有一些訪問的個案，是主訪人和受訪人不歡而散的例子。其中問題出在哪裡？這個值得研究。在我訪問的個案中，當然也有不歡而散的，但是大部分是有聯繫的，像有些居士或者法師，到現在還是一直有來往，彼此變成方外之交。不是訪問結束了、書出版了，這個友誼就斷了，有時候交情是可以繼續存在的。我想訪問本身就是一種善緣，這個緣從



開始到結束，甚至整個圓滿了，最理想的是還能夠延續下去。因為一個人一輩子能夠交到有話不談、知心的朋友，應該不會太多；如果透過訪問的過程，可以交到幾個知心的朋友，會覺得做口述歷史有它的收穫，有它的代價了。

像我有一位朋友訪問導演，後來兩人鬧翻了，這本書是國史館要出版的，我們承辦人很難處理，因為要通過國史館的審查，才能出版。又如見疇法師有一本 18 位比丘尼修行的訪談錄，是由國史館出版，當時是由我負責編務。這本書裡原來有 2 篇沒有取得受訪法師的同意，不能出版，由於書名就是 18 位，而且出版在即，後來我就向見疇法師建議，將原來的第一人稱改成第三人稱，重新改稿，就不會觸犯法律，書也可以出版了。因為第一人稱「我」是代表受訪人，出版一定要受訪人同意；第三人稱「他」是代表主訪人，是主訪人以他的立場、眼光來描述受訪人所談的事情，類似新聞報導的方式，就不需要經過受訪人同意。

口述歷史有其目的性，目的與我們原來設定的目標，息息相關。用三法印來貫穿整個訪問的過程，把「我」這個因素排除掉，「諸法無我」的原則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感覺訪問的本身，可以是一種法的顯現、佛法的展現。這是第一個原則。

(2) 「諸行無常」法則

訪問要趁早，做任何事也要趁早，覺得這件事情有意義，就不要觀望、徘徊，做就是了，否則過了這個時間，可能就沒有那麼好的機會，而且也可能沒有那個心情了。三法印的第二原則是諸行無常的法則。無常是生滅的，「生」是緣起

（有其條件）的生起，「滅」也是緣起。為什麼設定訪問名單時，要以年紀較大的為優先？雖然無常對每個人都一樣，但是基本上年紀較大的人會比較早往生，所以要趁著他頭腦清楚、願意講的時候，就請他多留下一些資料。口述訪問有時要和時間賽跑，有些值得訪問年紀較長的法師、居士，若沒有及早聯絡進行訪問，可能會因為年歲太大，或其身體狀況出問題，而喪失訪問的機會。例如我們曾計畫要訪問李世傑教授，但聯絡時，他已重病，不久就往生了。還有楊白衣教授的夫人楊林寶璧女士，年紀並不很大，日文也很好，原本也是我們想要訪問的對象，但沒多久，她也往生了。楊白衣是一個很有名的居士、學者，也留下一些不錯著作。另外，對胡秀卿中醫師的訪問，基本上已告完成，訪問稿正在整理中，沒想到她也因病逝世！讓人深感人命的脆弱。還有一些我們訪問過的對象已經離開的，如戒德法師、悟明法師，已分別於 2011 年 5 月及 7 月間先後圓寂；元亨寺菩妙法師、東和禪寺的源靈和尚、成一法師、葉阿月教授，也都已不在人世間！高雄的白雲禪師，幾年前也不在了，我們訪問他的時候，年紀也很大。我是開車到高雄，住在他寺院附近的汽車旅館，每天兩、三個小時，連續三天到他的辦公室去訪問；後來這一篇有出版，在他們的刊物也有轉載。因為有這一篇訪問稿，外面的人對他可能會比較了解。葉阿月教授是臺灣留學日本，對唯識學有相當深入的研究。所以，凡事要趁早，很多事情現在不做，以後就沒有機會了。

(3) 「涅槃寂靜」法則

涅槃，有真實、解脫之意，是學佛者的歸趣



所在。將「涅槃寂靜」法則使用到口述訪問時，可以把整個口述訪問看成是一趟學習之旅，對佛門人士做口述訪問，更是一種極為難得的「心靈請益之旅」。當主訪人從事口述訪問時，應該懷抱著《華嚴經》〈入法界品〉「善財童子」參訪五十三位善知識的精神。像現在上課的場地紫竹林精舍，是以《法華經》的理念精神建築的道場；我在想不知道有沒有人會想到用《華嚴經》的理念，或是用善財童子五十三參的概念，來蓋一座華嚴的道場。

從事佛教人士口述歷史，可以從不同的佛門大德中，了解他們是如何進入佛門？修學歷程如何？主修法門為何？在佛教界的角色、地位等等。從他們言談中，也可以發現其中有不少是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但受訪人的經驗雖值得重視，還是得檢驗。

我將訪問當作是學習的過程，也當成是一種研究的過程。透過訪問，我對於當代臺灣佛教史有一份更親切的體驗、更深入的了解。因為我是學歷史學出身的，最近一、二十年又研究佛教史，所以我對任何佛教界的人物都會從佛教史學的角度來看。例如這個道場、這個法師在臺灣的佛教史上的地位是如何來定位的。我是用這樣的方式來看臺灣佛教。其中有些團體、居士的表現不錯，有些可能會有問題。透過這樣一個角度來理解，再透過對於當代佛教人物的訪問，應該可以比較了解過去臺灣佛教的問題、目前臺灣佛教的現象以及隱藏的問題，然後再想目前的佛教要做哪些事，才不會被時代所淘汰。

六、以家族的口述訪問為例

如果要對家庭的長輩進行訪問，第一要考慮的是選定哪一位長輩來做，如家裡的阿公、阿嬤，或父親、母親，或外公、外婆等等。就口述歷史的運作來講，第一步要考慮的也是訪問的對象。如果有人選了，接著要徵求他的意願；如果願意接受訪問，再來是要考慮用怎麼樣的方式進行；同時，也要讓受訪的長輩知道你的目的是什麼。這個訪問的目的，就是每一個人的衡量，譬如我們對家庭長輩的訪問是為了要留下他個人或他對這個家庭、家族的貢獻，或歷史的作用是什麼，讓我們知道，也讓這個長輩知道。

為了要讓整個訪問過程進行得比較順暢，我們要對一個長輩基本的這一生，如六、七十年或七、八十年來的這一生，做了哪些事情、在什麼時間點有哪些轉折，又如出生的時間、求學、工作的情況、婚姻的情況，以及和家族的互動，或是和親戚、朋友的互動，都要有一些基本的了解。必要時，可以將這些問題先記下來，在訪問時，再按照問題的時間先後順序進行，因為是記載一個人從年輕、成長到年老的一個過程。所以，按照時間先後是一個很好的方式；此外，按照事情的重要性也是一個考慮。

已經準備好要問的問題，進一步是要和長輩約定時間，雖然有可能一天到晚都和他在一起，在同一個家庭，但也要看你和他之間什麼時間比較方便。時間約定好了，接著是地點，如在自己家裡、長輩的家裡，還是要在外面比較安靜的地方。時間、地點都有了之後，再來就是要準備器材。我們訪問是要錄音，還是也要將影像錄下來？當然，錄影也是一種保存史料的功能，但是因為那個鏡頭都不移動，如果從頭到尾都看錄影，也



會覺得很枯燥。如果是站在保存的立場，保留錄音、錄影的資料還是有它的功用和必要性。這些基本的設備有了以後，真正在做的時候，也要考慮到有沒有要將錄音的資料在訪問之後整理成文字稿，或是只是聽一聽，錄下來就好，還是錄音有了、錄影也有了，只採用其中一種。所以，這裡提到三種情況：聲音的檔案、影像的檔案、轉成文字。轉成文字的部分，是整個口述歷史的一個重點。目前將錄音轉成文字的處理方式，一種是用電腦的軟體辨識，直接將錄音資料轉成文字存檔，但是如果口音很重，可能效果不好；另一種是，如果沒有軟體，就要用死功夫——邊聽錄音資料，邊整理打字成文字稿。如果從來沒有做過這個工作，會建議先將錄音資料，如問答的方式，用逐字的方式先記錄下來，重複太多的部分可以不記錄，這是第一步。接下來是要考慮到整理成這樣的文字稿，誰能看得下去？我們的作法是，第一步將這些文字稿整理成比較通順、白話，一般人容易閱讀了解的文字。在整理文字稿的過程中，就要順便將重複太多的部分刪掉，或是時間先後次序不對的，作一調整，如後面才談到小時候的事情，就要將這一段移到前面；有些事情在前面談過，又在後面談到了，整理時就要將它們合在一起，刪掉重複的部分；還有最好能夠加上標題，按照時間的先後、事情的輕重，成為有頭有尾的文章。如果這位長輩的閱歷很豐富，可能要花很多次去訪問，之後要花更多的時間整理，整理出來可能是一本書。像過去十幾年來我在國史館和一些同事所做的，大部分都是屬於這一類。就是訪問十來次或是二十幾次，將這些文字稿整理成一本書，但是要投入相當大的心力，

才成了一本書。在整編的過程中，一本書和一篇文章的分量差很多。一本書可能有一、二十萬字，或二、三十萬字不等；一篇文章可能是一、二萬字或幾千字。如果這個長輩的閱歷不是那麼豐富，可能幾千字就可以將他的一生交代清楚。

除此之外，還會請這個長輩提供他個人的證件、履歷、書信、照片等等，我們也會將這些東西當作資料。如果這個訪問記錄稿有機會出版的話，像國史館出版口述歷史的書，也都有納入照片或證件。因為圖、文的搭配，對一般讀者會比較具有吸引力，比較看得下去，而且圖片本身就可以說故事，也可以展現當時的歷史情境。文字是一種方式，圖片又是一種方式，現在我們是要強調這些都要能夠具備。

前面所談的，是將口述歷史的整個過程都包括在這裡面。回到在訪問時要留意的部分。訪問時，原則上時間一次不要太長，大概兩個小時就好；以雙方都方便的時間為主，如上午、下午或晚上都可以；還有要考慮到長輩的體力、精神情況。此外，在訪談的過程中，也可以留意到幾個問題，如可以問這一輩子最難忘的或最傷心的或最得意的一件事，我覺得這個可能可以問到他最關鍵的部分；如果他有子女，也可以問他對子女的看法，或是他對宗教信仰的態度，或者對於政治的理念、看法，或是他幾十年來住在臺灣，對整個臺灣演變過程的心得、感想，這些都可以附帶的問。

以上，這都只是一個概要，大家可以用這樣的方式來進行。

另外，大家在訪問自己的長輩時，可以做一件事，就是訪問前或訪問後，試著用 500 字至 1,500



字左右，寫一個小傳。小傳的內容包括生平，如出生年月日、出生地點、家裡排行、求學經歷、求職的經過、婚姻情況、子女、兄弟姐妹等等，做一個簡單的交代。像我最近參加中研院白色恐怖受刑人案件的口述歷史訪問，有四、五位參加，受訪人大概有三、四十位，至少準備要出版 3 本書。邀請人是希望每一位受訪人，除了前面有牽涉到白色恐怖案件的案情介紹外，也對受訪人有一個小傳，放在案情介紹的後面。這樣可以讓讀者很容易了解，有時間掌握主角後，再來讀訪問的內容。寫小傳其實也是一個不錯的訓練。我們不只是整理訪問稿，還要有一個類似提綱挈領的方式將這個人的生平做一個小小的傳記。我覺得這件事大家可以考慮把它納入，剛好可以作為一種訓練。寫東西要訓練、訪問要訓練、記錄也要訓練，熟能生巧，講起來是老生常談，但確實如此。所以剛剛有說口述歷史很簡單，因為不需要知道太多的道理，只要很有心，抓到要領去做，慢慢就會了。

七、結語

口述訪問是一種技藝；簡單來講，就是一種技巧。一種需要特殊技能和個人學習的專業，經由訓練和長期實作而發展出來。這種技巧，你做了慢慢學就會了。大家都還沒有做過也不用太擔心，也不會太難，反正拿著錄音機去訪問就對了。如果要考慮到效果的問題，就要做一些準備，要有一些比較專業的部分。這些準備工夫，都是可以預先來訓練的。每個人都可以加入學習，從學習中成長。在這個過程裡面，如果我們很用心，就可以從中學到很多東西，因為這個是無形的，要靠個人去做，才能去體會。

(一) 留意口述歷史應有的工作倫理

工作倫理，是很重要的一項。佛教倫理學，在最近幾年才比較受到重視，口述歷史本身也有它的倫理。倫理是怎麼樣來做比較合乎道理。在進行口述訪問展開之前，主訪人首先要取得受訪人的同意，才能進行。在訪問過程中，主訪人必須留意與受訪人建立良好的關係，彼此要尊重，因為唯有透過尊重，受訪人才會信任我們，才願意毫無保留地說出隱藏（或封存）在他心裡的祕密。如此，訪問才會比較順利，訪問稿也才會比較生動。

主訪人對受訪人的談話內容，應負有不隨便外洩的責任與義務，例如：在正式出版時，涉及第三者隱私部分應刪除或斟酌修飾，或在出版時使用假名。此外，對受訪人提供的原始錄音及影像資料，在未得到其同意時，不得隨便對外發布。

(二) 口述歷史可能有的陷阱

歷史事實的錯誤，在任何的個案都有可能出現，如果能清楚受訪人所講的這一段背景，就可以找一些相關的資料來查證，避免這樣的陷阱發生。

1. 如何「抽樣」的問題

當主訪人擬定口述歷史計畫之前，就需依其主題，選定合適的受訪人。到底要訪問多少人？怎麼選取比較具有代表性的個案？都應加以考慮，才會有好的成果。如果沒有站在一個綜觀全局的角度，或是對訪問很了解，可能所選取的樣本是沒有辦法代表全體的。

2. 口述歷史的「效度與信度」問題

此與「樣本」的選取亦有關係，如何由「少量的樣本」「推論」到「其他人或多數人口群」，



並且立論能「站得住腳」？受訪人所講的內容是否合乎事實，是牽涉到信度、效度的問題。訪問的個案要比較多，才能夠代表整體，做推論時也會比較正確。例如大部分的個案顯示都是這樣子，但有的受訪人講述的內容可能因為記憶力的關係，或者為了讓自己比較有利而有意扭曲，就可能會有陷阱、不實的情況發生。

(三) 口述歷史對佛教史研究的貢獻

佛教歷史到底有甚麼作用？我當年考大專聯考時，第一志願就是歷史系；過了三、四十年之後，我覺得當初的判斷還不錯，而且當時也沒考慮出路的問題。本來希望我的小孩讀歷史，像司馬遷一樣，可是天不從人願，他現在在法國學音樂，這也是沒有辦法強求的。我最先是研究中國近現代的歷史，後來這一、二十年轉到佛教史的領域，發現這樣的決定並沒有錯，轉到佛教史也很好。從事佛教人物的口述歷史的過程中，在我的研究裡面，發揮了很多的作用。不是光從書本上，因為我可以透過一些比較深入的訪談，了解到一些背後運作的東西。

佛教研究應包括教理、教制與教史三方面。在這過程中，我對教理方面是很重視的。因為教理是帶動整個教史與教制，它是個領頭羊，但對一個學習者來講，這三者不可偏廢。唯有研究好教史，才能精確掌握教理與教制。因為我是從佛教史的領域來涉入這個方面，而佛教史也是我比較有把握的方面。剛剛自衍法師也向大家介紹，我除了臺灣佛教史以外，對中共佛教史也有一本專門的書出版（《浩劫與重生：一九四九年以來的大陸佛教》，2012年12月，妙心出版社）。就是我們除了了解當代的臺灣佛教史以外，對於對

岸他們建國以後的佛教是怎麼樣的發展，尤其在兩岸的關係，要知己知彼。

在佛教史的領域，我特別重視近、現代的佛教史。因為中國佛教兩千年，印度佛教也有一千七百年，總覺得距離我們很遠。過去我在政治大學主修的是中國現代史，當我把這個方向移到佛教史的時候，我會特別留意當代的臺灣佛教史，或者近百年來的佛教史，這是我比較專業的部分。在臺灣的佛教界，應該要重視臺灣佛教史，尤其是戰後臺灣佛教發展的一些情況。近幾年來，學界或教界對這一方面也相當重視，像江燦騰教授、闡正宗教授對臺灣佛教史就有好幾本著作。

一位稱職的口述歷史工作者，是可以將口訪工作內化為自己生命中的一部分，透過不斷的訪問，豐富自己的人生。我是佛教徒，同時也可以算是一個研究者，我的角色可說是雙重的，但我認為研究者的角色與佛教徒的角色是沒有衝突的。我看佛教的經論、佛教的歷史或當代兩岸的佛教現況的時候，是比較站在一個旁觀者或研究者的角度來看，要跳脫佛教徒的角色，這樣才夠客觀。我也將研究工作或訪問工作，當作是一種學習的過程，雖然我沒有很多時間參禪、打坐或者持咒、念佛，但我儘量讓自己正念分明，希望能夠隨時有一顆關懷大眾慈悲的心，投入自己相關的工作，將訪問能夠內化成生命中的一環，這是我努力的一個方向。

我現在比較少做訪問的工作，而且訪問的對象可能是政治受難者的家屬，但是所採用的方式或態度是一樣的。透過這些受訪人，可以讓我們學習到很多的東西。如果就佛教的訪問來講，可以讓我們更了解佛教，更了解佛教的義理。另外，



我們生長在臺灣，所以我對當代臺灣佛教也會特別留意、重視。口述歷史是掌握當代臺灣佛教史很重要的一種方式。

如果大家有需要做口述歷史，不一定是做佛教方面的，以社區展開，如衛武營，也是一個很好的方式；或是從家裡的長輩開始，如阿公、阿嬤，或是為其他的對象做口述歷史。有了目標、人選，就可以實際操作，將他們的生命故事記錄下來，對後人可能有借鏡的作用。在正式做的時候，自己也要做一些準備，例如要有明確的目標與規劃、正確有效的執行方法、深入掌握訪問技巧等。本著尊重對方的心，留下一些美好的記錄，達到美好的成果。

我所談的到此告一段落，謝謝。

【附註】

- 註 1：編輯組整理，〈敘說生命的軌跡〉，《青松萌芽》，19期（民 102 年 9 月），頁 22。
- 註 2：貝絲·羅伯森（Beth M. Robertson）著；黃煜文譯，《如何做好口述歷史》（*Oral History Handbook. 4th edition*），（臺北：五觀藝術管理，2004），頁 2。
- 註 3：唐諾·里齊（Donald A. Ritchie）著；王芝芝譯，《大家來做口述歷史》（*Doing Oral History*），（臺北：遠流出版社，1997），頁 34。
- 註 4：楊祥銀著，《口述史學》，（臺北：揚智文化，2004），頁 7。

問題討論

■高雄場

【問題 1】

請問現在可不可以利用電訪或者視訊的方式進行採訪？另外，如果採訪的對象是父母的話，父母會比較激動一點，可能很難客觀的去採訪。

【回答】

先回答第一個問題。視訊採訪也可以，但是它不如當面採訪親切。能夠當面採訪是最好的方式，非不得已才用視訊的方式，像受訪人在美國，視訊採訪會比較省時、省力，只要確定時差就可以了。過去我們也有這樣的經驗，就是當一次訪問稿整理出來以後，發現有一些問題還可以再問，但如果我只是為了再問二、三個小問題，從臺北到屏東或高雄，好像又不太經濟，所以就用電話訪問的方式。電話訪問最好是可以錄音，到時候就把它補到原來整理的稿子就可以了。這也是一種方式，但儘量還是以當面訪問比較好。

第二個問題是關於訪問自己的父母或者自己的長輩的問題。我以前要訪問兩個長輩，一個是我的岳父大人，他是水利出身的，有接受訪問；另一個是我爸爸，但他不願意。為什麼不願意？這可能和個人的個性有關係，或者他不方便向他的晚輩談自己的事，他只願意無意間透露一些話或一些事情。像你平常問他，他可能會講，但很正式的訪問，有錄音筆、錄音機甚至攝影機的時候，他就不願意。如果當事人是有意願的話，也不一定要我們自己來訪問，可以由他的朋友或者你的朋友來訪問，這也是一種方式。最主要還是當事人的意願。當事人如果一直都沒有意願，這事就不成就了。比如說我們要訪問教界的某位大德、某位法師，他沒有意願，誰跟他講都沒用。又如我們要訪問某位法師的時候，我們直接聯繫他不願意，但是透過這位法師的徒弟、這位法師的朋友，他就願意。所以，我們在決定要訪問的人選時，可能要考慮透過誰去講，透過怎麼樣的一個途徑，讓他願意接受，這個要做一些考慮。



我們有很多訪問，是因為他的朋友、他最知心的人建議我們去訪問，就可以愈訪愈多，水到渠成。

【問題 2】

請問在第一次訪問時，訪談者是不是要先自我介紹，讓受訪者能夠了解你是誰？是不是在第一次就可以說明今天訪問所設立的目標和目的，讓他可以事先了解？是不是要跟他建立了良好的關係，才能做深入的訪談？訪問時，是不是可以依照教授所講的程序和要領設計一個表格，讓我們在訪問時可以填寫來簡化時間？回來後，我們才慢慢的對內容用文字做彙整，最後再給受訪者看過。因為這邊的程序與要領提到一點是不能插話，但如果今天在訪談的時候，我感覺到他的回答不曉得是不是我聽到的，可不可以再問：你剛才講的是不是這個問題？

【回答】

如果已經確定訪問的對象，一定要讓對方知道你或你們是誰、是代表哪一個單位或是由哪一個團體介紹。像國史館在推動一系列有關臺灣佛教人物的訪問，就要把單位跟對方說了；如果是由紫竹林精舍負責推動，也要讓對方能夠了解你是誰。訪問不是去才說明你是誰，應該要在訪問之前聯繫好，也確定他願意接受訪問，這樣才能夠一去就可以馬上進行。因為您剛才還強調要節省時間，其實有時候不能趕、不能急、不能想要節省時間。要設計一個表格填寫也可以，但我剛剛有提到，很多東西把它訂得太死板，反而把自己綁緊了，就很難舒展。所以，要看當場的情境，來做一些回應。怎麼樣比較能夠很快達到效果，或是我們剛剛特別談到的深度訪談？那不是一開

始就談的，因為不知道要深入到什麼內容，要見機行事，可能覺得這個問題很重要、很特殊、很有意義時，再談下去。而且未必每個受訪者都可以讓你深度訪問，因為他了解的可能很淺。這是要看不同的個案，再看整個訪問過程進展的程度來決定的。深度訪談只是一個名詞，是用來說明可能可以這樣做。有時候它其實只是一個很平順、很平常的問答，但其中可能有很深的意義在。

插話這個問題，有時候會常常碰到，尤其是談到人、事、時、地、物。比如說他講了哪一個人不清楚，你就馬上再問他，這也是一種插話。這時要衡量會不會因為你再問他，而把他原來想要講的話岔開了。有一種方式是等整稿的時候再補，或者適當的時候先記下來，事後再補。所謂插話，也不是一定不能，但什麼時候跟他做一些回應或者再問他，我覺得作為一個訪問人應該對他自己或者對方正在進行的談話內容，都要很清楚，要把這件事情做一個定位，免得你被他拉著跑，甚至偏離了主題。談話有時候是一種拉扯的過程，在這對話過程裡面，談出我們所認為精彩的部分。到底什麼時候插話？可能引起的反應是什麼？都要自己能夠了解。因為可能你問了，他底下就沒話說了。

【問題 3】

如果受訪者話很少的時候，該怎麼辦？

【回答】

第一個是我們一定要對他個人基本履歷很清楚，要不然他話很少，你對他不清楚就無從問起，這是基本的。再來剛剛也談到儘量不要一個人去，話很少時，同行的人或旁邊的弟子，或他的



家人，可能會有一些話題要問；或是有一些照片也可以引起一些回憶。話多少有時候是天性，天性就很難說了。

■臺中場

【問題 1】

我想要訪談的對象是我公公，但是我公公現在有老人失智症和帕金森氏症，請問可不可以公公、婆婆一起採訪？

【回答】

可以，但是夫妻一起採訪要考慮後續整理文字稿的問題，是要將訪問內容整理在一起，還是分開整理。

【問題 2】

請問任何一個研究部分，我們都要重視研究倫理，很多事情都是萬事起頭難，用什麼樣的方式可以讓受訪者開心？還有為了避免觸碰到他某個點，這方面的拿捏，可不可以請教授為我們指點？

【回答】

訪問要比較有績效，算是一個比較成功的訪問個案，一定要得到他的信任。以訪問長輩來講，在這個家庭裡面，這個長輩從小就很疼愛你、很喜歡你、很信任你，訪問時，可能會無所不談，可以談出很多東西；如果他討厭你，看你不順眼，這個時候如果要訪問，最好的方式是另外再找一個一起去。訪問不一定是一對一的方式，可以是二對一或二對二的情況。因為一對一有時候會尷尬，二對一在交談的過程裡面，就有潤滑的作用。要先取得他的信任，讓他們清楚我們做這個的目的，是要讓他談他對這個家族的貢獻；如果你不談，我們就不知道，以後的子孫也就不知道你對

家族的努力是什麼。要讓他能夠談出很關鍵或者很重要，或者他可能覺得比較想談的問題，就要慢慢的引導。有些問題不要直接問，要慢慢的順著他的話，再找時間切入你要問的部分；如果他不願意，你也無法勉強。如果有適當的情境、適當的時間點，有些人心裡不會談的話還是會談出來。人真是很微妙，在交談的過程中，有時候你會不太想講太多，有時候你會覺得講太多了；講得太多，可能就會沒有顧忌，全部都講出來了。可能我們希望好的訪問對象是講太多的人；當然，講太多的人不是全部都要寫出來。講的內容和正式發表的內容，其實還有一些距離。我的訪問經驗是，希望我訪問的人什麼都可以講，但是未必全部公開，因為可能涉及一些個人的隱私或者第三人的問題。所以，訪問就是儘量讓他能夠多講。

【問題 3】

我們在訪談的時候，要先將訪談的問題給受訪者？還是訪談的當時，直接現場問這些問題？

【回答】

這兩種情況都可以。他這一輩子如果很單純，如普通的家庭主婦，他願意和你聊天，也知道你要聊什麼，你不給他看也沒有關係；如果他很想知道你要問的問題，你先說也無妨。設定問題是為了提醒我們，訪問時不要把整個談話的主軸偏遠了、偏離了主題，主要是提醒自己的作用。因為有時候沒有一個主宰，做事情沒有一個中心目標，可能會岔題，偏離太遠了。所以，設定訪問問題的目的，是要提醒自己重要的問題不要漏掉，該問的都要問到。



【問題 4】

我年紀比較大，沒有長輩，我可以把我自己的點點滴滴記錄下來，給我的兒女、子孫看嗎？

【回答】

可以啊！這個記下來就不用再麻煩人家來訪問。如果我們準備訪問的人，他自己可以寫，就鼓勵他自己寫。所以，對於有心自己寫，就可以讓他自己寫，沒問題。在歷史學裡面，自己寫的，稱為自傳；這個是口述歷史，但同樣都是將過去的事情記下來，整個功用都一樣，只是它的過程不一樣而已。自傳是自己寫，傳記也是有其他人寫的，是屬於他傳，但是對於史料保存歷史都一樣有它的功用，有它的貢獻。

【問題 5】

請老師舉例說明，對於第一次訪談，而且訪談者與受訪者彼此是陌生的時候，可以用什麼方式切入，讓對方信任我們？

【回答】

以我們過去的經驗是，要訪問的人可能從來沒見過，但是當我們要和他見面之前，都會有一些詢問、安排，讓他了解我們要做什麼。例如訪問某位法師、長老，已經事先透過電話表明我們的身份——我們是國史館，現在有一個計畫，由於您對臺灣佛教的貢獻，我們覺得是一個很值得訪問的對象——讓對方很清楚了解我們是誰、大概有幾位、去訪問的時間等等；到了現場後，怎麼樣讓對方第一次見面就很樂意和你談，因為之前有準備了，問題也不會太難。不要一開始就把錄影機、錄音機架起來，讓對方有壓力；可以先從聊天開始，介紹自己、介紹所屬的單位，如國

史館隸屬的單位、館長、部門、業務、出版品等，慢慢的切入正題。雖然錄音、錄影已經在事先聯繫時就取得同意了，但當場還是再讓受訪者了解有需要錄影、錄音。等機器都架設好了，再開始切入正題，用輕鬆愉快的談話方式進行，不要像考試一樣，準備 10 個題目，讓受訪人壓力很大。我們自己要先放鬆，對方才不覺得拘謹，尤其是第一次碰面。例如我去訪問年紀比較大的比丘尼、老和尚尼，又有男女僧俗的問題，這時我們通常會有 2 位或 3 位女同事一起去訪問，比較容易順暢運作。如果是一對一，在尷尬的時候，可能不知道要說什麼，或者不知道怎麼回話。所以，一起去訪問的人，要培養默契，知道什麼時候說什麼話，這樣問話和接話才會順暢。

【問題 6】

剛剛教授有提到，如果當事人、受訪人故意捏造不實，經過我們三角檢證法證明他是錯的，第一，我們要不要告訴他？第二，如果他執意要你寫出來，該怎麼處理？

【回答】

當事人明顯的錯誤，未必是有心的，有時候他不一定知道。我舉一個例子，成一老和尚是在整個中國大陸政局、國民黨尚未撤退的時候就來臺灣了，後來再把智光老和尚他們接過來。訪問時，因為外省法師會對原來臺灣佛教有一點誤解或看輕的味道，他認為日本統治臺灣的這五十年，當時臺灣的這些所謂的師父都沒有受戒，但是當時是有的，有的還到福建鼓山受戒，而且資料很多。後來我們整稿時就向老和尚提這件事，他好像也不太同意，但我們就在文字上做一些斟



酌，沒有按照他講的來寫，不能讓對臺灣佛教史或印度佛教史有研究的人看出裡面錯誤太多。我們為了要處理這樣的情況，在裡面做一些婉轉的敘述，但基本上是合乎史實的。類似這樣的情況，可以用這個方式來處理。如果當場反駁他，可能會槓起來，也不好；可以提，當時就尊重他的錯謬，但正式發表時，就要符合歷史事實，否則整個訪問的成果就會大打折扣，因為行家一看就知道錯謬，而且錯謬會帶來負面的評價。

【問題 7】

教授有提到在公開場合所陳述的資料整理出來要公開化，如果是對我們的長者所做的資料，萬一做到一半，因為無常而無法繼續，而且資料只是家族要保留的，那麼這些資料，如收藏或整理，是不是一定要做這麼多程序才能展現出來？假如訪問某一個長者，他現在生病很嚴重，訪問的資料是告一個段落以後，他就因為無常，後續的部分，是否可以借助旁人或是對我們長者有進一步了解的人，將這些資料整理出來？

【回答】

口述歷史當然一定要由當事人來講，但呈現的資料也未必都是當事人所講的。有另外一種處理的方式，是由他旁邊的人，或者如果是老師，可以由門生、故舊相關的人來談這個人。例如國史館出版蔣經國的訪談錄，因為沒有辦法訪問蔣經國和蔣宋美齡了，就找和蔣經國或蔣宋美齡過去比較親近的這些人；2013 年 12 月底出版的《嚴家淦總統行誼訪談錄》，也是找過去與嚴家淦比較親近的相關人物進行訪談而成書的。你所提的問題，長輩不幸走了，沒辦法講，已經講的部分

也可以整理，其他部分也可以再透過旁邊的人把它補充完整。至於要不要出版，這是個人的決定。如果數位的聲音有了，錄音帶或者影像都可以考慮留下來，文字也可以整理。就一個家族來講，除非他是一個很大的人物，否則出版的可能性還不大。或許你可以考慮用小本、小冊子的方式，在家族、親友間流通。

【問題 8】

因為我的父親已經往生，我是不是可以用生平的追溯或故事的方式去呈現？我寫的時候，想從這個方面先學習，我的方向也是一樣，照程序來，只是訪問的對象可能是我的母親，或是父親的兄弟姐妹。整理方面，因為不是和父親本人訪談，我怕事實真相沒辦法去追溯，這樣做出來的資料是不是可以用？

【回答】

因為你要訪問的當事人已經不在，也可以訪問他的另一半或他的其他親友，但整理的時候，我覺得應該保持原來訪問的風格。例如你父親不在，你母親健在，這是由母親來談父親，整理時還是可以保持母親的第一人稱，或是由父親的妹妹或姐姐來談，也可以保持原來父親的妹妹、姐姐的角色，用第一人稱，但角色不要錯亂掉。

【編者按】本文為「時光旅行：口述歷史工作坊」2014 年 4 月 19 日高雄場及 5 月 3 日臺中場之錄音稿，經編輯組彙整，講者審閱後刊載。

